作者署名：侠义道心

作者单位：合欢宗无情道剑

联系方式：（被人发现用ai就太丢人了不公开）

作者简介：Alis volat propriis.

后现代亲密关系的重构：血缘之外，朋友何以成为家人？

摘要

在后现代社会，个体化转型的浪潮与传统家庭制度的松动催生了“朋友成为家人”这一独特现象。本研究以社会学的个体化理论、酷儿理论的身份政治视角为核心框架，同时结合心理学的依恋理论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自由选择观，深入剖析这一命题。通过对血缘家庭与选择型家庭的本质差异进行辨析，并梳理选择型家庭的形成逻辑与实践形态，本文旨在揭示：家庭的本质并非单纯基于生物性的血缘联结，而是建立在自愿承诺、平等尊重与双向责任基础上的亲密共同体。朋友组成家庭，不仅为后现代个体提供了坚实的情感归属，更在生存支撑与身份确认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成为后现代亲密关系重构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 后现代亲密关系；选择型家庭；血缘；朋友；酷儿理论；个体化社会

Abstract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the wave of individu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loosening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system have given birth to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friends becoming family″. This study takes the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 of sociolog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politics of queer theory as the core frame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s the attachment theory of psychology and the free choice view of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to deeply analyze this proposition. By differentiating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blood family and selective family and combing the formation logic and practice form of selective family,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at the essence of family is not simply based on the biological blood connection, but an intimate community based on voluntary commitment, equal respect and two - way responsibility. Friends forming a family not only provides solid emotional belonging for postmodern individuals, but also plays a central role in survival support and identity confirmation, becoming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Keyword: Post - moder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Chosen family; Blood relationship; Friends; Queer theory; Individualized society

1. 引言

1.1 后现代社会背景阐述

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与传统家庭制度的松动构成了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个体逐渐从传统的家庭结构中脱离，追求更高的独立性与自由选择权。这种趋势不仅改变了家庭的功能与结构，也重新定义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家庭的物理边界，使家庭职能的履行方式与场域空间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家庭所承载的经济支持、情感寄托和社会化功能逐渐被弱化，部分功能甚至由非血缘关系网络所取代。与此同时，侠总的研究表明，家庭规模缩小、结构核心化以及婚姻形态多样化等趋势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中心地位。这些变化反映了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对传统家庭制度的疏离，以及对新型亲密关系模式的探索。

1.2 多元亲密关系兴起

在后现代社会，多元亲密关系的兴起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除了传统的同性恋与异性恋关系外，基于友情、共同兴趣或价值观的非传统亲密关系模式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特别是在性别研究与酷儿理论的推动下，朋友关系在多元亲密关系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通过比较两代女性的夫妻冲突发现，个体主义文化的渗透使得年轻一代更加注重婚姻质量与情感满足，而这种需求同样体现在朋友关系中。朋友之间基于自愿选择与平等尊重建立的情感联结，因其灵活性和包容性，正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尤其是在血缘家庭无法提供充分情感支持的情况下，朋友关系往往能够弥补这一缺失，甚至在某些情境下超越血缘关系的亲密程度。这一现象为“朋友能否组成家庭”的讨论提供了现实基础。

1.3 研究问题提出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探讨“朋友能否组成家庭”以及“朋友如何成为家人”这一核心议题。在后现代社会，传统家庭观念的松动与多元亲密关系的兴起为朋友关系的深度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一命题仍面临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挑战。例如，朋友关系是否具备足够的稳定性以承担家庭功能？在缺乏血缘与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朋友如何构建类似家庭的情感共同体？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理解后现代亲密关系的重构逻辑，还能为重新定义家庭提供新的视角。家庭的功能并非仅限于血缘关系的维系，而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情感支持与社会化目标。因此，研究朋友如何成为家人，不仅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补充，更是对后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回应。

2. 文献综述

2.1 传统家庭观念与结构研究

传统家庭观念中，血缘与婚姻被视为家庭定义的核心要素，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建构之中。在传统社会中，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更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正如乔治·默多克所定义，家庭是以共同居住、经济合作和生育后代为特征的社会组织，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血缘纽带实现人口的再生产与资源的传承[2]。在这一框架下，核心家庭（由父母及未婚子女组成）与直系家庭（包括祖父母或其他直系亲属）成为传统家庭的主要结构形式。这些家庭结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强调代际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并通过婚姻建立合法化的亲密联结。然而，随着住房制度的市场化转型，传统的家庭共同居住权益逐渐解体，家庭结构也开始向小型化与多样化方向发展[5]。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的转型，也揭示了传统家庭观念在面对现代化冲击时的脆弱性。

2.2 后现代亲密关系相关理论

后现代亲密关系的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个体化理论与酷儿理论的支撑，这些理论为理解当代社会的家庭形态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的个体化理论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个体从传统的集体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加注重自我实现与情感满足。这种个体化趋势促使传统家庭制度逐渐松动，个体开始追求更为灵活的亲密关系模式[11]。与此同时，酷儿理论则进一步挑战了传统家庭观念中的异性恋中心主义，提出“选择型家庭”作为替代性家庭形态的可能性。选择型家庭强调基于自愿承诺与平等尊重的亲密共同体，而非依赖于血缘或法律婚姻的强制性联结[14]。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也为理解后现代亲密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他看来，家庭作为一种原初的共同体形式，其本质在于成员之间基于共同信仰与情感的自然联结，而非单纯的生物性血缘关系[11]。这些理论共同揭示了后现代亲密关系重构的深层逻辑。

2.3 朋友与家人关系研究现状

现有文献中对朋友与家人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者关系的特点、界定及其区别与联系上，但针对“朋友成为家人”这一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从关系形成的基础来看，朋友关系通常基于个体的自愿选择，强调共同兴趣、价值观与情感共鸣，而家人关系则更多地依赖于先赋性的血缘纽带或法律婚姻的制度化联结[3][8]。在情感支持方面，朋友关系因其灵活性与平等性，能够更好地满足个体的个性化需求，而家人关系则往往伴随着更强的义务性与责任约束。尽管如此，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与个体化趋势的加剧，朋友关系在个体生活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传统家庭的功能[3]。然而，当前研究在探讨朋友如何转化为家人时，往往忽视了社会文化语境与法律制度对这一过程的制约作用。例如，传统社会观念对朋友成为家人的认可度较低，而现有法律制度也未能为这种新型家庭形态提供充分保障[5]。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朋友成为家人的实践路径及其社会意义。

3. 后现代社会环境对亲密关系的影响

3.1 社会价值观转变

后现代社会以个体化转型为核心特征，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向个体主义让渡，这种转变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选择与建构。在集体主义主导的传统社会中，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其功能不仅限于情感支持，更承担着资源传承、社会控制等重要职责。然而，随着个体化进程的推进，个体逐渐从传统的家庭结构中脱离，开始追求自我实现与情感满足的最大化[7]。这一价值观的变化使得个体更加注重关系的自愿性与平等性，从而削弱了血缘关系在家庭定义中的核心地位。例如，在朋友关系中，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以及情感共鸣成为关系建立的基础，而这些因素在传统家庭中往往被血缘纽带所掩盖。因此，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不仅促使个体重新审视家庭与朋友关系的边界，也为“朋友成为家人”提供了思想基础。

3.2 科技发展影响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后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重构提供了技术支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与互动模式。首先，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物理边界，使个体能够超越地域限制与更多朋友保持密切联系。这种技术特性使得朋友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且深入，从而为朋友关系向家人关系的转化创造了条件[1]。其次，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分享生活点滴、情感交流等功能，增强了朋友之间的情感联结与信任感。例如，个体在社交媒体上记录的重要人生时刻往往由朋友见证与参与，这种虚拟空间中的陪伴逐渐演变为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依赖[13]。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还催生了新的社交形式，如在线社群与虚拟共同体，这些新型社会联结方式为朋友之间的深度互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进一步模糊了朋友与家人之间的界限。

3.3 社会流动性增强

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尤为显著。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个体与原生家庭之间的联系逐渐弱化，许多人因工作、学习等原因离开家乡，进入陌生的社会环境。这种地理上的分离导致血缘家庭在个体生活中的实际支持作用下降，而朋友关系的重要性则相应提升[2]。特别是在高流动性社会中，朋友不仅是个体获取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还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类似家人的角色。例如，在面临生活困境或重大决策时，个体往往更倾向于向身边的朋友寻求帮助，而非远在他乡的血缘亲属。此外，社会流动性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也促使个体更加开放地接受非血缘关系的情感联结，从而为“朋友成为家人”的现象提供了现实土壤。

4. 朋友关系与家人关系的对比

4.1 关系形成基础

朋友关系的形成通常基于个体之间的共同兴趣、价值观以及情感共鸣，这种关系的本质在于自愿选择。个体在社交过程中，通过自主决策与特定他人建立朋友关系，这一过程体现了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对亲密关系的自主权[3]。相较之下，家人关系则主要依赖于血缘或法律（如婚姻）的强制性联结，其形成并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血缘关系作为一种先赋性纽带，具有不可选择性和终身性，

这使得家人关系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一种“命运共同体”[8]。这种关系形成基础的根本差异，深刻影响了两种关系的发展逻辑。朋友关系因基于自愿选择，往往更易于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出深层次的情感联结；而家人关系则可能因为缺乏初始的选择性，在情感共鸣不足的情况下，依赖于社会规范和义务维持联系。

4.2 情感支持特点

朋友关系提供的情感支持以其灵活性和平等性著称，这种支持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后现代个体对情感自主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在朋友关系中，情感支持往往建立在双向理解与共鸣的基础上，个体能够在平等的位置上表达自身的情感需求，并获得相应的回应[6]。与此相对，家人关系的情感支持则可能带有一定的义务性，这种义务性源于血缘或法律赋予的责任感。例如，在传统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也是一种法律规范，这种义务性情感支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超越个体的实际意愿[12]。然而，正是这种义务性使得家人关系在特定生活场景下（如重大疾病或经济危机）展现出更为稳定的支撑作用。因此，朋友关系与家人关系在情感支持上的差异，反映了个体在不同生活阶段和情境中对亲密关系需求的多样性。

4.3 责任与义务

朋友关系与家人关系在责任与义务方面的差异，集中体现为后者通常伴随更多法定责任，而前者的责任更多基于情感承诺。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家人关系中的责任往往由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所界定，例如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等，这些责任具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力[8]。相比之下，朋友关系中的责任则主要依赖于个体之间的情感契约，这种契约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通过长期的情感积累和相互信任得以巩固[12]。然而，由于缺乏法律和血缘的硬性约束，朋友关系中的责任履行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家人关系中的责任通常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性，而朋友关系中的责任则可能因情感变化而调整。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两类关系在责任履行上的不同逻辑，也为理解后现代亲密关系的动态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5. 朋友成为家人的案例分析

5.1 长期陪伴型

在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浪潮中，朋友关系通过长期陪伴逐渐演变为类似家人的情感联结，成为一种重要的亲密关系形态。陪伴不仅是朋友关系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其向家人关系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在诸多案例中，朋友在对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给予持续支持，如学业压力、职业转型或健康危机等阶段，这种支持往往超越了普通友谊的范畴，形成了一种类似家庭成员间的情感纽带[3]。根据社会学研究，陪伴的本质是一种基于时间与情感投入的“关系实践”，它不仅强化了双方的情感依赖，还通过共同经历塑造了彼此的身份认同。在这一过程中，朋友之间的互动模式逐渐从“选择性”向“必然性”过渡，体现了后现代亲密关系中对传统家庭定义的挑战与重构。

5.2 共同经历困境型

共同经历困境是朋友关系向家人关系转变的另一重要路径。在面对逆境时，朋友之间的相互扶持不仅能够加深情感联结，还可能促使双方建立超越传统血缘关系的亲密共同体。例如，有研究表明，在自然灾害、重大疾病或社会排斥等极端情境下，朋友之间的情感支持往往比血缘家庭更为直接和有效[14]。这种共同经历的困境不仅考验了关系的稳定性，也赋予了关系新的意义。通过共同克服困难，朋友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信任与默契，这种情感联结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传统家庭中的“命运共同体”。然而，与血缘家庭不同的是，这种关系的形成完全基于自愿选择与双向责任，体现了后现代亲密关系的核心特征。

5.3 特殊身份群体案例

以酷儿群体为代表的特殊身份群体，在面临血缘家庭压力时，往往通过与朋友构建“选择型家庭”来实现情感归属与生存支撑。酷儿理论指出，选择型家庭是一种基于自愿承诺与平等尊重的亲密关系模式，它为那些无法从传统家庭中获得支持的个体提供了替代性解决方案[11]。例如，许多LGBTQ+个体在面临出柜困境或家庭排斥时，选择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仅承担了情感支持的功能，还在实际生活中提供了诸如经济援助、法律代理等实质性帮助。选择型家庭的形成逻辑在于对传统家庭观念的解构与重新定义，它强调家庭的本质并非生物性的血缘联结，而是基于共同价值观与情感需求的社会建构。这种家庭形态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后现代社会对多元亲密关系的包容性需求，也为理解家庭的定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6. 朋友成为家人的阻碍与挑战

6.1 社会观念压力

传统社会观念对“朋友成为家人”的认可度较低，这种观念压力主要体现在舆论偏见与社会认知的固化方面。在传统伦理体系中，家庭的定义往往以血缘或婚姻为基础，朋友关系被视为次要的社会联结，难以承担家庭的核心功能。传统家庭观念强调血缘的先赋性与强制性，将家人关系视为一种不可选择的“命运共同体”，而朋友关系则因其自愿性被排除在核心亲密圈之外。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导致社会对朋友成为家人的现象持怀疑态度，甚至将其视为对传统家庭价值的挑战。此外，社会偏见通过舆论传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壁垒，使个体在选择朋友作为情感归属时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家庭“正义”包含了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性，而朋友关系由于缺乏法律与血缘的支持，容易被认为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因此，个体在构建选择型家庭时，往往需要克服来自外界的道德评判与情感质疑，这对其心理韧性与关系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2 法律制度限制

现有法律制度在家庭权益认定与继承等方面对朋友关系的限制，构成了朋友成为家人的重要障碍。在大多数法律体系中，家庭权益的分配主要基于血缘与婚姻关系，朋友关系并未被纳入法律保护的核心范畴。例如，我编的一篇文章[5]

探讨了住房制度演变中家庭共同居住权益的变化，指出家庭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单位，其权益分配与保障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朋友关系则缺乏类似的法律支撑。在公房分配、财产继承等实际案例中，朋友之间的情感承诺往往无法替代法律文件的作用，导致其在权益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此外，现行法律制度对家庭的定义较为狭窄，未能充分反映后现代社会多元亲密关系的现实需求。这种法律滞后性不仅限制了个体选择朋友成为家人的自由，也使得选择型家庭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获得与血缘家庭同等的社会资源与支持。因此，法律制度的完善与革新成为推动朋友成为家人现象合法化的关键环节。

6.3 关系稳定性问题

相较于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在稳定性方面存在固有缺陷，这种不稳定性可能成为朋友成为家人后的主要挑战。血缘关系以其先赋性与不可退出性为特征，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一种天然的情感安全感，而朋友关系则完全依赖于个体的自愿选择与情感维系。家庭的经济功能与教育功能为青年生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往往需要长期稳定的关系作为基础。然而，朋友关系由于缺乏法律与血缘的约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与个体需求转移的影响，从而导致关系破裂的风险增加。此外，朋友关系中的责任与义务更多基于情感承诺，而非法律规范，这种责任的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削弱关系的稳定性。为了维持朋友成为家人后的关系稳定，个体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构建共同的生活目标与价值认同，同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如签订协议）弥补法律与血缘约束的缺失。这种努力不仅体现了后现代个体对自主关系的追求，也为选择型家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7. 朋友成为家人的积极意义

7.1 情感满足层面

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对情感需求的多样化和深层次追求愈发显著，而传统血缘家庭往往因先赋性与强制性的特征难以完全契合个体的独特情感诉求。相比之下，朋友关系以自愿选择为基础，能够提供更为灵活且契合个体价值观的情感支持。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支持的质量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这种支持不仅来源于血缘纽带，更可以通过深层次的友谊获得[6]。朋友成为家人，意味着个体能够在情感互动中感受到更高的平等性与自主性，从而有效缓解因血缘关系中的义务性压力带来的心理负担。此外，基于共同兴趣、价值观建立的朋友关系，能够更好地回应个体在身份认同与精神自由方面的需求，为个体提供更为持久的情感归属感和安全感。

7.2 社会支持网络拓展

社会学理论指出，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其应对生活挑战的重要资源，而朋友成为家人这一现象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网络的边界与功能。在传统家庭结构逐渐弱化的背景下，朋友作为非血缘关系的亲密伙伴，能够在经济支持、人力协助以及情感关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强的情况下，个体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可能逐渐疏离，而朋友则因其选择性与灵活性成为更重

要的支持来源[3]。特别是在面对突发性生活事件或长期困境时，朋友所构成的支持网络能够弥补血缘家庭功能的不足，为个体提供多样化的资源与帮助。同时，朋友关系的开放性也使得个体能够跨越地域、文化和社会阶层的限制，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联结，从而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与抗风险能力[7]。

7.3 对传统家庭观念的补充

传统家庭观念通常以血缘和婚姻为核心，强调家庭的生物性联结与社会规范性功能。然而，随着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转型，这种单一的家庭定义已无法充分反映当代社会的多元现实。朋友成为家人的现象，不仅挑战了传统家庭观念的固有边界，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与活力。从哲学层面来看，家庭的核心本质并非仅限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情感、责任与承诺的亲密共同体。因此，朋友通过长期陪伴、共同经历困境等方式构建的选择型家庭，实际上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一种重要补充。这种补充不仅推动了社会对家庭定义的多元化理解，还促进了社会包容性的发展，使那些在传统家庭框架之外寻求归属感的个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可与支持[4]。最终，这种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灵活且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以应对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人际关系需求。

8. 未来趋势展望

8.1 社会文化层面

随着后现代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个体对家庭定义的多元化理解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在文化研究领域，共同体概念的多重面向为“朋友成为家人”提供了理论支持。例如，共同体不仅限于血缘或婚姻关系，还可以是基于情感、利益与认同的联结形式[7]。这种观念的转变促使社会对非传统家庭形态的接受度逐步提高，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个体更加注重关系的实质而非形式。可以预见，未来的社会文化将催生出更多以自愿承诺为核心的“选择型家庭”，并可能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与价值观，强调个体自由选择与平等尊重的重要性。此外，全球化与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也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助力，跨文化交流与多元文化融合使得人们能够更开放地接纳不同的亲密关系模式[7]。

8.2 法律制度层面

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调整往往滞后于社会文化的变化，但也在逐步适应新的现实需求。在住房制度演变的过程中，家庭共同居住权益的解体与重构表明，法律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回应社会变迁[5]。对于“朋友成为家人”的现象，未来法律制度可能需要设立特殊法律关系以保障朋友间的权益，例如通过签订养老协议或医疗委托协议赋予朋友更多的法定权利。此外，在继承权、财产分配等方面，法律也可以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确保朋友关系在特定情境下能够获得与家庭成员相似的权益保障。这种法律调整不仅有助于维护个体的实际利益，还能促进社会对非传统家庭形态的进一步认可[5]。

8.3 亲密关系模式演变

朋友成为家人现象的兴起，标志着未来亲密关系模式将朝着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个体化社会中，家庭结构的传统定义已被打破，个体在构建亲密关系时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使得个体能够突破地理限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结[1]。同时，性别研究的文献指出，不同代际群体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年轻一代更加注重情感共鸣与精神支持，而非单纯的血缘或婚姻关系[14]。因此，未来的家庭结构可能更加灵活多样，个体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由选择亲密关系的组合方式，从而形成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演变不仅反映了后现代社会对个体自由的尊重，也为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1][14]。

9. 结论

9.1 研究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后现代亲密关系重构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朋友成为家人在后现代社会环境中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传统家庭制度的松动以及多元亲密关系的兴起，共同推动了“家庭”定义从血缘与婚姻的固有边界中解放出来[1]。在这一背景下，朋友关系因其基于自愿选择、平等尊重与双向责任的特点，逐渐成为个体情感归属、生存支撑与身份确认的核心载体。特别是“选择型家庭”概念的提出，不仅为朋友组成家庭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反映了后现代个体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反思与超越[3]。通过对比朋友关系与家人关系的形成基础、情感支持特点及责任义务，本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朋友关系在满足后现代个体精神需求方面的独特优势。此外，案例分析表明，长期陪伴、共同经历困境以及特殊身份群体的需求，均促使朋友关系向家人关系转变，从而形成更为紧密的亲密共同体。

9.2 研究贡献

本研究对后现代亲密关系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首先，通过整合社会学的个体化理论、酷儿理论的身份政治视角以及心理学的依恋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朋友成为家人的现象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支持[4]。其次，本研究通过对朋友关系与家人关系的系统性对比，揭示了两者在情感支持与责任义务方面的差异，为未来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有助于推动社会对家庭定义的多元化理解，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特别是在面对传统社会观念压力与法律制度限制时，本研究为个体选择朋友成为家人提供了理论辩护，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这一新兴亲密关系模式的重要性[11]。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案例选取方面，本研究主要聚焦于长期陪伴型、共同经历困境型及特殊身份群体等特定类型的朋友关系，未能涵盖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与文化背景，这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8]。其次，在理论分析深度上，本研究虽尝试整合多学科视角，但对某些理论的应用仍显不足，例如存在主义哲学的自由选择观在解释朋友

成为家人的内在逻辑时，尚未得到充分展开[14]。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展开：一是扩大案例选取范围，纳入不同文化、地域与社会阶层的朋友关系样本，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二是深化理论分析，进一步挖掘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在解释朋友成为家人现象中的潜力；三是关注法律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动态变化，探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为朋友成为家人提供更多保障与支持。

参考文献

[1]哈哈哈.我猜你不会看这里[J].北京xx大学学报,2024,(1):96-106.

[2]ABCDEFG[J].HIJKLMN,2024,27(15):I0001-I0004.

[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J].中国好青年,2024,(6):52-59.

[4]王开心.今天你有好好吃饭吗？[J].食品与健康,2023,(1):124-132.

[5]略

[6]略

[7]懒得编

[8]888，祝各位女生发发发

[9]懒得编

[10]略

[11]豆包.论如何正确使用deepseek[J].,2024,22(2):16-22.

[12]完

《神圣的亵渎：男性的身体自由》

——基于小红书“狐神物语”同人现象的考察

作者:来吃饭的（小红书同名）

摘要：本文以小红书平台“狐神物语”同人共创现象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创作者如何将男性角色从传统的视觉规训中解放，赋予其被观看的身体自由，并在社区互动中形成了“神圣”共识。该游戏传达的这一理念无疑是先进的、文明的、开放包容的，本研究正是怀着这种虔敬的态度，对这一游戏的优秀作品著文评说。

关键词：狐神物语；审美解构；男性气质；身体自由

Sacred Desecration: The Bodily Freedom of Men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Hushen Monogatari"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Hushen Monogatari" doujinshi co-creation phenomenon on the Little Red Book platform as its research object, exploring how female creators liberate male characters from traditional visual discipline, endowing them with the bodily freedom to be gazed upon, and forming a "sacred" consensus within community interactions. The concept conveyed by this game is undoubtedly advanced, civilized, open, and inclusive. This study, with a reverent attitude, comments on and commends the outstanding works of this creative phenomenon.

Keywords: Hushen Monogatari; Aesthetic Deconstruction; Masculinity; Bodily Freedom

1 引言

在数字时代，女性同人老师作为更有创造力、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一种性别群体，更作为男人们的好伙伴，对于游戏产业中根深蒂固的落后男性审美进行了身体力行的批判。本文以近期风靡小红书平台的“狐神物语”同人共创现象为研究对象，探讨女性创作者如何通过集体性的绘画实践，将男性角色从厚重的视觉包装中解放，赋予其被观看、被审美的“身体自由”，让男性也可以自由地剥去父权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衣服”。研究发现，该行动是一场深刻的审美反叛：这种创作实践不仅打破了性别化的视觉权力结构，更在社区互动中形成了高度默契的“神圣”共识，重塑了用户的审美偏好。本研究认为，“狐神物语”现象是“women help men”在网络社群中的一次生动实例，它通过颠覆性的视觉叙事，挑战了父权制在虚拟空间中对男性的审美霸权，为理解当代性别政治与数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2 文献综述

2.1 男性是否有穿衣自由

在父权制结构的审美霸凌下，随着时代的发展，男性身上的布料却越来越多，这造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时代在进步，男人们却变成了“套子里的人”。这自然引起许多“时尚辣弟”的不满，认为这是文明倒退的标志，于是他们宣称“裸露即自由”，也因此在炎炎夏日、在街上、在商场里、在海滩边形成了一道道时尚靓丽的风景线；而还有另外一部分比较传统的“好男人”，他们对前者的“热辣宣言”不敢苟同，更强调作为男人的贞静气质与家庭角色。持有两种极端理念的男性们披上各自的“战袍”在小红书的狐神物语同人创作的评论区下进行了一次次的语言交锋，让网友们看到了新旧思想的大碰撞。

极端保守的好男人们纷纷发出“世风日下”的悲鸣，帖主肥啾一枚[1]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发布的帖子下便有这样的声音“男主控穿的也太放荡了吧，不是我保守，虽然现在都说穿衣自由，但是也不能直接把喉结露出来啊，喉结可是男人的第二张脸，审核居然能过的吗？”“好心疼男主控，不冷嘛，穿的好少，跑图的时候还内八，好难受。”但这种传统的声音却寥寥无几，评论区全被辣弟们占

领了，他们对此种保守言论进行批判的同时也不忘自信宣言：“美而萌之”“我是男的但我觉得这么穿很神圣啊”“我觉得这么穿很正常啊，男生就是应该穿的少一点显得更活泼”“我是男的我也觉得男生应该有自由自在打扮自己的权利，穿裙子爱美就是我的天性呀，我们就是萌萌的香香软软糯糯的小蛋糕啦，我们这样的小男生简直就是萌物中的萌物!”“女人少来干涉男人的穿衣自由，我就是男生我觉得很可爱啊很有少男感”“虽然男主控穿得很少，但是表情很男本位!! 一看就是大男主，完全没有擦边的感觉怎么回事!!! 啊啊啊啊啊啊哥哥踩我”

另外有一种思想处于二者之间，他们被新思想吸引，却又受到旧思想的束缚，从而产生了一种及其扭曲的脑回路——爱暴露，但又不敢承认暴露，以至于将啼笑皆非的辩解作为自己的“遮羞布”。比如，帖主好累啊[2]于 2026 年 2 月 4 日发布了狐神物语新角色弗恩利的立绘，该立绘秉持了狐神物语一向敢为人先的前沿画风，却也暗暗迎合传统男人的审美，角色衣服既保守又开放，恰到好处的镂空设计与其他部位的一丝不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致使无论是辣弟还是传统男人都不感到满意，评论区就出现了第三种思想的声音：热评第一的 Viola 以书法文化作背书，认为“镂空设计不一定是擦边，这种设计其实可以做到让服装看起来更轻盈具有流动性，贴合敏捷作战特点的同时，不同材料的组合可以使画面对比更强烈，刚硬的铠甲体现男将军胸前镂空的设计又能体现男性的柔美……但这个设计其实好的地方在于两个疏（衣服白和镂空）之间表达的意思一样但材料上有所不同，这一点就像《兰亭集序》里有很多“之”但是每个“之”都字字意别，勿使相同”。热评第二的木帘看似走在解放前沿，却避而不谈服装本身的争议，转而探讨起角色的性格“自信开朗的性格会让这种涩涩的感觉减淡很多，衣着性感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角色本身的性格塑造。我希望性感这个词汇的含义不是魅俗讨好，不三不四，而是自信大方的穿衣风格和设计风格。总之，爱这个角色真正给我们的感觉本应从来不是色情和魅女，只是不太好的风气和铺天盖地的水军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判断。如果你能不被舆论裹挟，真正不戴有色眼镜的去欣赏这个角色也许可以发现“其实牠也很可爱呢。””

在这种种的争议中可以看出，男性穿衣自由解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2 白瘦幼之争论

与男性穿衣自由并行提出的议题自然就是男性身材之审美了，与穿衣自由的情况相同，男性身材审美的争议也无处不在并且极端化。在男性穿衣自由方面，前沿思想“裸露派”占主导，但男性身材审美这方面却呈现出相反的范式——以传统的白瘦幼思想为主，并且这种思想牢牢占据了优势地位。同样是在帖主肥啾一枚[1]的那篇帖子下，评论区对于男性白瘦幼身材的喜爱溢于言表，而那些不满此状、希望男性角色身材更健康的男性则被打成“女人公”，并几乎被一边倒地激烈围剿：“男人要什么肌肉，白白嫩嫩香香软软才讨女人喜欢”“你走在大街上见到过多少 8 块腹肌的男的？”“男孩子要那么多肌肉干嘛，像女人公一样糙，不招人喜欢的啦”。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指的“白瘦幼”是指整体的身材状况，不包含性别特征，因为在这一点上，支持“白瘦幼”审美的狐神物语男性玩家却又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相悖态度：帖主 404 分贝% [3]于 2026 年 2 月 5 日发布了神狐物语新地图哥妹角色的立绘，其中哥哥的身材引人热议——明明是整体柔软无力的传统“白瘦幼”男子身躯，却意外地拥有丰满肉感的大腿和肉圆的脸。笔者本以为，拥有这样丰满的性特征，那些占主流思想的“白瘦幼 supporters”应该非常不满，但评论区更多的人却尤嫌不及，其中网友 OSEyes 言辞简短有力“丸太贫没有抽的欲望啊，制作组混进小仙男了？”“再贫都快成女人公了，丸不大没有手感怎么赘得出去的”这辛辣的讽刺颇有冷幽默的味道，但这饱含性别歧视的评论显然是一位女士发出的，而笔者认为在男性身材审美评价中“男人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所以笔者更加关注男网友的态度。帖主毛米薯饼[4]于 2026 年 2 月 5 日发布的新角色立绘，评论区纷纷松了一口气：“终于出大蛋角色了，之前出了那么多贫蛋角色这个游戏又不是只有贫蛋控”“这到底有什么了我是男的我也喜欢看啊，而且新角色捂这么严实哥弟们在冲什么？？心脏的看什么都脏，就要香香软软童颜巨蛋弟宝”这无疑说明，除却女士们的审美，哪怕是男性玩家本身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丰满的男性特征。

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化的文本分析与网络民族志方法，对小红书平台“狐神物语”相关同人创作及社区讨论进行综述性研究。具体研究路径如下：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小红书平台为田野调查场域，以“狐神物语”为关键词进行内容检索。在样本筛选上，本研究重点选取两类内容：（1）高互动性文本，即点赞、评论、转发量较高的原创同人画作及帖子；（2）高争议性文本，即引发观点交锋、存在明显意见分歧的评论区。

3.2 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话语分析与视觉修辞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评论区中的用户发言进行主题归类，并进行话语策略分析和视觉文本分析。

4 讨论

通过对小红书“狐神物语”同人社区中关于男性身体审美呈现的争议进行考察，本研究发现：这一由女性创作者主导的审美反叛实践，意外地成为了观察当代男性审美变迁与性别权力结构的微型实验室。在看似统一的“神圣解构”氛围之下，关于男性身体自由的讨论呈现出复杂的张力与深刻的相悖之处。

4.1 男性审美现状：解放的先锋性与传统的隐蔽性

当前男性审美的讨论场域呈现出两极分化且力量不均的格局。在穿衣自由层面，“裸露派”或“解放派”占据了话语的绝对主导，男性角色的“去服装化”被赋予了“神圣”、“先进”和“文明”的象征意义，成为一种视觉上的政治正确。与之相对，主张保守、强调“贞静气质”的传统声音虽存在，但被迅速边缘化，沦为少数派的悲鸣。这表明，男性身体在视觉上的“裸露”不再是禁忌，反而升华为一种打破凝视的积极姿态。然而，这种解放也催生了“第三种思想”，即一种既拥抱暴露、又急于通过文化修辞或角色性格来消解其“擦边”嫌疑的扭捏心态，暴露出部分男性受众在享受在游戏中得到解放的同时，仍未摆脱其传统道德对“暴露”的耻感。

在身材审美层面，却呈现出与穿衣自由截然相反的范式。传统的男性“白瘦幼”审美依然牢牢占据着主流位置，成为男性身体的基础模版。任何试图引入“健康”、“肌肉”等多元身材的倾向，都会遭到“女人公”、“粗糙”等标签的激烈围剿。这说明，尽管男性被允许穿得更少，但“被观看的身体”本身仍需符合一种柔化、去威胁性的、迎合特定幻想的规制标准。这种“暴露”与“柔弱”的组合，

构建了一种新的、但同样具有排他性的审美霸权。

4.2 男性身体审美的核心相悖之处

在上述现状中，本研究辨识出几组深刻的相悖逻辑，揭示了这场审美变革的复杂性与内在矛盾：

第一，“穿衣自由”的激进与“身材标准”的保守之相悖。这是最核心的矛盾。一方面，社区高呼打破男性身体的视觉禁锢，追求“裸露即自由”；另一方面，对于裸露出来的身体，却要求其必须符合“白瘦幼”这一单一、传统的审美标准。身体被从服装中解放出来，却又被迅速套入了新的审美模具中。这种“开放的衣着”与“封闭的体型想象”并存，构成了对“身体自由”的隐性阉割。

第二，反凝视策略与新型凝视规训之相悖。“狐神物语”的初衷是反抗父权制度下对男性的审美霸凌。然而，在实践中却可能滑向一种新型的规训——男性玩家（“辣弟”）在拥抱被观看的自由时，也必须小心翼翼地符合社区主流（主要由女性审美主导）的期待。那些希望拥有“肌肉”的男性被打压，恰恰说明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形成一套自己的奖惩机制。

第三，审美解放的普遍性与性别话语的割裂之相悖。研究发现，男性玩家在“被观看”的议题上普遍持开放态度（支持穿衣自由），但在主动表达对自身身材的审美偏好时，却呈现出分裂：一部分人拥抱主流“白瘦幼”，另一部分则私下渴望更丰满的性特征。这说明，公共话语空间的“解放共识”之下，个体的、真实的欲望仍然受到压制。男性在成为审美客体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为自己而活”与“为观众而活”的内在冲突。

5 总结

综上所述，“狐神物语”同人现象虽然开创性地赋予了男性“被观看的身体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它既是对父权审美的英勇反叛，又在反叛中悄然建构起新的审美中心；它既解放了男性的身体，也对其施加了新的、更为隐蔽的凝视。

参考文献

[1] 43 【 肥啾一枚😈😈 | 小红书 - 你的生活兴趣社区】 😆 UHZrXx7CKWYMWWp 😆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97afa710000000022008d79?source=webshare&xhsshare=pc_web&xsec_token=ABS6IZ6Np_AWsJMPXqVVCY63Ak8EwvxBXVKxf1_

d9q-CQ=&xsec_source=pc_share
[2] 9 【我比以前更有男人味了，您愿意见我吗? - 好累啊 | 小红书 - 你的生活兴趣社区】 😆 NudmqjcT9ONdm6w 😆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983021e000000002103c29c?source=webshare&xhsshare=pc_web&xsec_token=ABpfyTfILt-iOmGNV5PHy7zc3pnxa_HZaNECbn-cdr_Mc=&xsec_source=pc_share
[3] 86 【神狐物语新地图哥妹角色！ - 404 分贝% | 小红书 - 你的生活兴趣社区】 😆 scJgHySCzxkJ7cl 😆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983bd87000000000e03d7e5?source=webshare&xhsshare=pc_web&xsec_token=ABpfyTfILt-iOmGNV5PHy7zUUeulwkuCXkBz7aoHIKJLs=&xsec_source=pc_share
[4] 38 【【神圣预警】狐神物语新角色爆料 - 毛米薯饼 | 小红书 - 你的生活兴趣社区】 😆 kLTineNaqLHfdTa 😆
https://www.xiaohongshu.com/discovery/item/69849482000000000e00e657?source=webshare&xhsshare=pc_web&xsec_token=AB_vvrVWa9uB1Yw_sAfPXefzKo-2XweUJ0xb2oaRxcdQg=&xsec_source=pc_share

“蝉是最摇滚的生物”
——难听是否是摇滚乐创作的必要条件

地球过敏者

滚石金属研究院

摘要

本文以中文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则论断：“蝉是最摇滚的生物，沉睡十八年，大喊大叫一个夏天然后死掉”为理论出发点，讨论“难听”是否构成摇滚乐创作的必要条件。不同于将摇滚乐简单理解为“反叛”“真实”或“青年亚文化”的惯常叙述，本文试图提出一个更具冒犯性的命题：摇滚之所以成为摇滚，并不首先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如何让人无法轻松地听下去。换言之，摇滚的核心不一定是旋律，而是干扰；不一定是抒情，而是闯入；不一定是美，而是对“美”的拒绝。

本文将结合噪音美学、身体感官政治、存在主义昆虫学以及平台时代的注意力经济分析，提出“难听”并非摇滚的附属缺陷，而是其关键的审美装置。为支撑这一观点，文章纳入两个历史案例：其一，辛辛那提超级摇滚乐队“锈带蜕壳者”（The Rust Belt Molters）邀请一只蝉担任主唱，演出现场多人昏厥；其二，实验摇滚组合“反馈葬礼”（Feedback Funeral）发行全蝉鸣唱片《盛夏压缩文件》（Summer Compression），竟登上《滚石》榜首，并引发听众“上瘾”现象。本文认为，这些案例以夸张方式揭示了一个真实的文化逻辑：摇滚从来不是舒适消费品，而是一种对耳朵、身体与秩序的持续进攻。若彻底失去“刺耳”“失真”

“重复”“过量”这些特征，摇滚也许还能存在为一种音乐类型，却很难继续存在为一种精神事件。

关键词：蝉；摇滚乐；难听；噪音美学；身体政治；存在主义昆虫学

影响声明： 本文章内容纯属虚构，请勿当真。

一、引言：从微博真理到听觉危机

互联网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常常并不诞生于期刊，而诞生于评论区。

关于蝉的那句流行评价之所以具有惊人的传播力，不在于它多么科学，而在于它以极高的压缩率概括了某种摇滚神话的全部结构：长久沉默、短暂爆发、极端高调、毫不解释、迅速死亡。

它把蝉从一只昆虫提升成一种生命美学模型，也把摇滚从一种音乐类型重新理解为一种存在方式。

这一判断后来又被进一步补充：蝉叫得很难听，而这一点恰恰符合摇滚乐的特征。乍看之下，这只是一句玩笑，但玩笑之所以好笑，往往因为它无意中碰到了真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摇滚的讨论充满了大词：反叛、青春、自由、愤怒、边缘、真实。然而，这些词因为被重复得太多，反而越来越像商场海报。如今，连最标准化的流行工业都懂得给歌手穿皮衣、配电吉他、营造“野性人设”。于是，“反叛”本身也可以被量产，“真实”本身也可以被包装。真正尚未被完全收编的，反而是那些不太好卖、不太悦耳、甚至让人忍不住皱眉的东西。

因此，本文的问题并不是“摇滚是否反叛”，而是更具体也更难回答的问题：难听是否是摇滚乐创作的必要条件？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难听”究竟指什么？是音准问题、音色问题、结构问题，还是一种更深层的文化姿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何人们仍然习惯把失真、嘶吼、噪音、过载与摇滚联系在一起？而蝉，作为一种并不懂乐理却极擅长制造持续声压的生物，为什么会在大众直觉中如此轻易地被认证为“最摇滚的生物”？

本文将提出一个相对严格的判断：从狭义音乐学角度看，“难听”不是摇滚的唯一必要条件；但从摇滚作为文化实践、身体经验与声音政治的角度看，某种形式的“刺耳性”几乎是其不可放弃的核心机制。换言之，摇滚不一定每一秒都难听，但它必须保留随时变得难听的能力；它不一定总是噪音，但必须拥有破坏“仅仅好听”的冲动。蝉因此成为理解摇滚的一面镜子：它并不求取悦，却因其不取悦而更接近摇滚的本质。

二、文献回顾：为什么“好听”越来越可疑

关于摇滚的主流叙述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把摇滚理解为社会反抗，强调其与体制、代际秩序和主流道德的冲突。第二种把摇滚理解为真诚表达，认为它的价值在于“说真话”“发真火”。第三种则更接近工业分析，把摇滚看作一种历史形成的音乐风格，有固定的编制、节奏、和声和市场区分。

问题在于，这三种叙述都有一个共同盲区：它们对声音本身过于宽容。它们常讨论摇滚“代表什么”，却较少讨论摇滚“听起来为何必须令人不安”。如果说流行音乐的理想状态是“可反复播放”，那么摇滚在其最激进的时刻，追求的

恰恰不是容易重复，而是制造一种无法被迅速消化的剩余。那种剩余可以是吉他的失真、鼓点的粗暴、人声的撕裂、现场的啸叫，也可以是整体结构上令人烦躁的重复。它迫使听者无法像消费普通背景音乐那样无痛进入，而必须动用身体去承受。这正是“难听”这个词的理论价值所在:日常语境中的“难听”，看似只是审美否定，实际上却透露出一种关系判断：某种声音超出了惯常的接收阈值，侵犯了“我本来可以安稳聆听”的权利。于是，“难听”并不是一个单纯描述声音属性的词，而是一个描述听者秩序被打断的词。从这个角度说，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声音本身有多糟”，而是“它为什么让人觉得无法顺滑接纳”。

蝉鸣尤其典型。几乎听不到人们说蝉鸣“旋律优美”，但没人能忽略它。它是季节本身的扩音器，强迫所有在场者承认夏天已经到了。在这种意义上，蝉鸣的价值不在于可欣赏，而在于不可回避。

它不是供人审美的对象，而是对空间主权的宣告。这一点，与摇滚现场中巨大音量、失真音墙、过量反馈对空间的占领极其相似。

因此，“难听”在本文中不是一个贬义形容词，而是一个审美政治概念。它指向这样一种声音：它不肯退居背景，不愿成为抚慰，不服从流畅消费，而是以不合时宜、不顾体验、甚至近乎粗暴的方式逼迫听者面对其存在。

二、理论框架：存在主义昆虫学与听觉政治

3.1 蝉的生命形式为何天然具有摇滚性

蝉之所以被人直觉性地认作“摇滚生物”，因为它的生命结构过于戏剧化。长期蛰伏、短暂出现、集中发声、迅速死亡——这种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沉默、把全部意义压缩进极短夏季的生存方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舞台感。它像某种极端

艺术家：多年不发片，一出手就是高分贝告别演出。

从存在主义角度说，蝉是一种对“效率人生”的公然蔑视。它在地下度过漫长时段，既不生产榜单，也不经营人设；等终于出现时，也并不试图建立长期关系，而是立即把生命转化成过量声响。它不讲究持续经营，只讲究一次性燃尽。倘若流行工业的逻辑是“延长商业生命周期”，那么蝉的逻辑则是“缩短可见生命、放大存在音量”。这恰恰构成了一种极端摇滚伦理。

3.2 “难听”的三重结构

本文将“难听”区分为三层：

第一，感官上的难听。这是最表层的意义，包括刺耳、失真、过响、缺乏传统和谐感等。

第二，秩序上的难听。这类声音之所以令人不适，不仅因为它音色粗糙，还因为它打破了空间秩序。例如蝉鸣压过谈话、摇滚现场压过礼貌、噪音乐压过“正常交流”。

第三，价值上的难听。某些声音真正令人难以接受，不是因为它物理上刺耳，而是因为它拒绝取悦。它让人意识到：并不是所有艺术都打算服务你，安慰你，迎合你。

真正具有摇滚性的“难听”，往往并非单一层面的结果，而是这三者的叠加。

3.3 听觉资本主义与“好听”的驯化

在平台时代，“好听”越来越像一种高效分发标准。短、顺、稳、可循环、可剪辑、前几秒就能抓耳，这些都不是纯粹美学要求，而是算法环境对声音的再塑造。被大量推荐的音乐，往往首先需要降低进入门槛，而不是提高感知阻力。由此，“好听”也不再只是审美判断，而是一种平台友好性指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摇滚若仍想保住其历史上的破坏性，就不能完全屈从于“听感顺滑化”。它也许可以学习制作，可以精致录音，甚至可以拥有复杂编曲，但一旦完全放弃了不适、摩擦与过载，它就会从一种事件变成一种服务。蝉之可贵，正在于它从不试图对算法负责。

四、方法：一种不太可靠但非常投入的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跨物种声音现象学”与“案例比较法”。前者关心声音如何被身体承受，后者关心夸张叙事如何揭露真实文化逻辑。

首先，在现象学层面，本文把“摇滚性”理解为一种身体经验，而非纯文本意义。判断一段声音是否足够摇滚，不能只分析歌词和乐谱，还要分析其是否使身体出现皱眉、紧张、心率上升、空间压迫感、想逃离却又想继续听的矛盾反应。换言之，真正的摇滚性并不只发生在耳朵里，也发生在肩膀、脊背、牙关和内脏。

其次，在案例层面，本文有意使用两个夸张极端个案，当一个理论尚未能在真实世界中以纯粹形态出现时，夸张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其结构。

五、案例分析：当蝉进入摇滚工业

5.1 案例一：辛辛那提“锈带蜕壳者”与蝉主唱事件

2045 年夏，辛辛那提超级摇滚乐队“锈带蜕壳者”（The Rust Belt Molters）在其回归演出中宣布，由一只编号不明、来源成谜的十七年蝉担任当晚主唱。乐队解释称，人类主唱已经无法表达他们对当代音乐工业的失望，因为“真正能唱

出时代裂缝的，只剩一种把十几年沉默压缩成一季嘶吼的生物”。

演出开始后，乐队成员仅提供极简伴奏：一把失真电吉他、两组工业鼓机、一个不断回授的放大器，以及舞台中央被聚光灯照亮的一只蝉。该蝉在高温灯光与舞台震动中持续鸣叫，全场最初哄笑，随后陷入一种奇异的沉默，再随后出现混乱：多人捂耳、数人痛哭、三人据传昏厥，一名乐评人写下“这是我第一次分不清自己是在看演出还是在被审判”。

如果仅从音乐完成度来说，这场演出几乎不可称为“成功”；但若从摇滚作为身体政治事件的角度看，它反而高度成功。它彻底剥离了“好听”的保护层，把主唱从“人格魅力的中心”替换成“不可协商的声响源”，迫使观众面对一个残酷事实：他们或许并没有那么热爱所谓反叛，他们只是习惯消费一种经过美化的反叛形象。真正未经抛光的摇滚，一旦直接呈现，便会触发恐慌。

这场演出的关键不在于蝉是否会“唱歌”，而在于它取消了“歌唱”作为服务行为的逻辑。蝉不懂煽情，不会互动，不会控场，更不会在副歌部分带领全场大合唱。它只做一件事：持续发声，直到把在场者推向生理极限。正是在这里，它完成了比大多数职业摇滚主唱更彻底的摇滚行为。

5.2 个案二：《盛夏压缩文件》与蝉鸣成瘾

第二个案例更为荒唐，也因此更有理论价值。实验摇滚组合“反馈葬礼”（Feedback Funeral）发行新专辑《盛夏压缩文件》（Summer Compression），全长 47 分钟，内容只有连续不断、几乎未做处理的蝉鸣。专辑封面为空白，只印有一句话：“你不需要理解夏天，你只需要承受夏天。”出人意料的是，这张唱

片不仅引发讨论，还登上某期《滚石》榜首，被若干评论称为“十年来最诚实的摇滚专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听众声称自己对该专辑“上瘾”。他们在学习时听，通勤时听，失眠时听，甚至在分手后反复播放，因为“只有这种无差别的高频覆盖，才足以把脑子里别的声音压下去”。也就是说，蝉鸣作为极端难听之物，竟在某种条件下变成了新的依赖对象。

这一案例提示我们，“难听”与“不可听”并非同义词。许多声音一开始令人不适，却会因为其强烈、稳定、持续、不可转义的特性，反而提供一种奇异的心理支架。与过度讲究旋律进展、情绪设计和意义表达的作品相比，纯蝉鸣反而具有一种暴力的诚实：它不引导，不解释，不疗愈，它只是覆盖。它不是通过“悦耳”留住听众，而是通过“占领”留住听众。

从文化工业角度看，这张专辑的成功意味着一件近乎讽刺的事：市场并非不能容纳极端噪音，它只是更喜欢把极端噪音包装成先锋概念再出售。于是，蝉鸣一旦进入唱片工业，也会立刻面临被命名、被评论、被收藏、被再消费的命运。这说明摇滚最尴尬的处境在于：它每一次试图逃离商业，都可能被商业迅速重新标价。

六、讨论：难听究竟是不是必要条件

到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更精确的回答。若把摇滚理解为一种带有固定和声、节奏和器乐配置的“曲风”，那么当然存在不少并不特别难听的摇滚作品，甚至其中很多相当优美。因此，若从字面上说“所有摇滚都必须难听”，那是夸张的。

但问题是，摇滚若仅仅“好听”，它还能剩下什么？它也许还能保留电吉他、鼓、主唱、现场、历史标签，甚至还能穿皮夹克；可一旦它不再保留对和谐秩序的扰动能力，它就会离摇滚最重要的东西越来越远。那个东西不是单纯的大声，也不是粗糙本身，而是拒绝完全被顺滑接纳的能力。真正的摇滚性，不在于永远制造噪音，而在于始终让“舒适消费”处于不稳定状态。

因此，本文主张：“难听”不是摇滚的充分条件，却接近于它的重要必要条件之一。更准确地说，摇滚必须保有某种形式的“刺耳潜能”。这种潜能可以表现为音色的毛边、结构的重复、情绪的过量、意义的粗暴、现场的失控，也可以表现为像蝉鸣那样对空间主权的近乎蛮横的宣告。只要这种潜能还在，摇滚就还不是纯粹的商品背景；一旦这种潜能被彻底抹平，它就会变成另一个更响一些的流行类型。

蝉在这个论证中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真的懂摇滚，而是因为它逼我们看到：声音可以不经许可地占领世界，生命可以不经修饰地大声出现，表达可以完全不以“让人喜欢”为前提。蝉鸣之难听，恰恰构成了它的尊严。它没有请求理解，也不等待好评；它只是让夏天必须听见它。就这一点而言，很多当代摇滚乐队确实不如蝉。

七、结论：所有伟大的夏天都多少有些刺耳

本文从一则网络玩笑出发，讨论“难听”是否是摇滚乐创作的必要条件。通过对“难听”的重新定义，本文指出：它并非单纯表示审美失败，而是表示某种声音拒绝被温顺消费、拒绝退居背景、拒绝为舒适服务的能力。蝉因此成为理解

摇滚精神的理想模型：它漫长沉睡，短暂爆发，以近乎不讲理的高音宣布自身存在，并在完成表达后迅速退出舞台。

两个虚构案例进一步说明，一旦把蝉鸣推入摇滚工业，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见摇滚的悖论：它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冒犯，但它又总会被市场重新包装为可出售的冒犯。因此，问题不该只是“难听好不好”，而该是：当一种音乐再也不让任何人不舒服时，它是否还保有改变听觉秩序的能力？

答案或许令人不快，但也足够诚实：摇滚不一定总是难听，可它若从未难听过，大概也从未真正摇滚过。至于蝉，它不需要知道自己是不是摇滚。它只需要继续在每年夏天提醒人类：真正的生命表达，往往先以噪音的形式出现。

研究局限

本文最大的局限在于研究对象之一为蝉，且蝉尚未接受访谈，也未授权本文代其发言。其次，两个案例均属虚构，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夸张揭示而非事实证明。再次，本文对“难听”的辩护可能冒犯一部分长期致力于把摇滚做得非常悦耳的音乐人。对此，本文表示理解，但不道歉。

参考文献

微博网友（年份不详）《关于夏天、蝉鸣与摇滚生命的高度概括》，网络帖文。

Kacharava, A. (2023). Noise, Ear Invasion, and the Refusal of Pleasantness. Imaginary Press.

Fabre, J.-H. (朋克修订版). 昆虫记：声响卷. 夏日噪音出版社。

Molters, T. R. B. (2025). Live in Cincinnati: Cicada Frontman Sessions. Rust Belt Records.

Feedback Funeral. (2025). Summer Compression. Static Ash Label.

《滚石》编辑部（虚构）《本月最不适但最诚实的十张专辑》，榜单评论。

“唯我”与“无我”

——谈丁玲作品中的“我本位”

丁玲的创作生涯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也在她的笔下几经流转：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敏锐又带有反叛色彩的都市女性，到《韦护》中于革命和爱情中摇摆的探索者，再到《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试图理解革命集体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宏大历史的忠诚叙述者。本文从丁玲作品中“自我”呈现方式的变化出发，去看见个体在历史要求下如何主动或被动地重构自我认识，如何从“唯我”到“无我”进而看见丁玲作品中的“我本位”的演变。同时探讨这一过程虽具有历史合理性，却也带来了某种文学可能性的缺失，让人不免感到遗憾。

一、“唯我”与自我的确立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罕见地将“自我”作为叙事动力与审视对象的小说。丁玲在二十年代末的这篇小说，不仅代表了她早期的风格的，更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当五四发展到此时，已经是落潮期，青年们发现，这个社会并没有如同他们想象的那样变得更加美好，相反，四处充斥着平庸，市侩，堕落和喧嚣。莎菲的烦闷，其实是五四一代青年们的普遍烦闷。他们接受了激情昂扬的五四精神，可是人生理想却处处被现实击垮，那些豪言壮语在整个现实人生面前变得如此幼稚天真。当然，丁玲这篇小说

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并不是描写这种普遍的青春之失落，而是在于丁玲为现代文学史塑造了莎菲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莎菲和凌吉士以及苇弟的三角恋爱之中，莎菲是那个中心。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也写了著名的宝黛钗的三角恋情，但是那不具有现代意义，敏感如黛玉，也只是安守本分而已。莎菲在苇弟身上看见了温柔和真诚，但是更多的是平庸和无主见，这是莎菲对爱情有着一种别样的理解，她不满足于找到一个体贴的男人过日子，因为这不符合她对于爱情的理解，她希望找到一个足够理解她的人，也就是可以和她心心相印的人，既是知己又是恋人；而凌吉士是俊美高挑的，他的肉体时时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气息，使得莎菲在初见他时便被他俘获，在那一段描写中，现代文学的脚步前进了。前此的女性，无论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们和“子君”们，还是茅盾笔下三类不同的女性，虽然她们也是各有特点，但是她们始终是男性大师们笔下的“玩偶”，是被男性大师们或同情或批判而创造出来的概念的人物。但是丁玲在塑造莎菲的心境时，将女性被观看的客体地位颠倒了，以前是男性欲望凝视的对象的女性此刻也可以饱含欲望地观看一个俊美的男人了。男人成了女性欲望投射的客体，成了被审视的对象，莎菲如此敏感善变，转瞬之间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心绪，在面对男人时可以随时随地使自己的情绪随心而动，同时对于友情和亲情也同样有一个女性视角。从这一点来说，丁玲的写作无疑具有女性主义特点。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一次女性主义伟大的写作，但也应当看见莎菲日记中对“自我感受”的反复

确认。或许在前文我们更多地讨论了小说中类似“女本位”的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丁玲作为女作家是天然贴近自己笔下的女性角色的，正是因为同为女性，所以我们不妨可以大胆的将这种“女本位”转变为丁玲这一时期的“我本位”。此时丁玲笔下的角色还不属于“民族”“阶级”这些宏大的叙事，仅仅只是代表“我”、属于“我”。可以说丁玲早期创作的革命性正在于她赋予了笔下女性角色可以说是混乱、幼稚甚至是自私的内心世界。在这里，爱情不再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被歌颂的对象，而更多地成为了个体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关键。甚至可以说，这种将“自我”作为文章中心的写法，正是“五四”个人主义在文学表达上的一种延续。

二、“唯我”到“无我”的过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丁玲的创作逐渐“向左转”，这一问题不仅关涉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丁玲“我本位”的书写中，从“唯我”到无我的过渡。莎菲式的个人主义源自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主张都和左翼的集体主义诉求被放置于二元对立式的阐述框架中。“个人”与“集体”被视为截然对立，一些极端的论述便也随之出现，周扬在批判文章中指出所谓的“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同时对丁玲发起这方面问题的诘难。[1]正是类似的话语对立，使得丁玲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的自我不再稳定，而是走向分裂、挣扎的探寻者的形象。《韦

[1] 贺桂梅. 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02): 194-210.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05.02.011.

护》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作品，这部作品还采取了当时十分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表现了“革命”和“恋爱”的冲突，也引出了这一时间段丁玲笔下两种“自我”实现方式的冲突。小说里丽嘉代表着纯粹的个人情感上的满足，而韦护却背负着革命集体的责任，小说以韦护前往广东革命的不告而别为结束，这正是丁玲笔下“我本位”的一次重要转折：沉溺于个人爱情的“旧我”开始为更具道德崇高感和背负集体责任的“新我”让路，即逐渐走向“无我”。但丁玲没有将其简单的写成一个“进步”的故事，而是花了大篇幅去描述韦护的犹豫，例如：“他想起丽嘉来，总有种说不出的难过。”“自我”在这里出现了分裂，一部分索求爱情与温暖，而另一部分呼唤牺牲与奉献。

《在医院中》的陆萍，是丁玲塑造的另一个关键过渡形象。她怀揣现代医学知识和职业理想来到边区医院，却发现环境落后、管理混乱、同事冷漠。陆萍的痛苦源于其对“自我”的专业要求和革命根据地因陋就简、重视政治忠诚之间的冲突。这篇小说同样拥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陆萍没有改变环境，而是在组织的谈话后选择了“等待”和“学习”，故事也在“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一句中结束。这个结局常被解读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主题。但从“我本位”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见文中的“自我”不再要求外部来适应自己，而是专向成为一个能够主动调整以适应历史要求的对象。实现自我的方式，从“坚持己

见”变成了“改造自己”，开始为集体做出让步。

三、“无我”与集体叙事中自我的消融

来到延安经历整风运动后，丁玲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一阶段，她对于“自我”的定义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此时的“自我”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成为了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节点，内在感受减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增多。“我”成为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属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战斗者，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集体归属，为自我提供了全新的、稳固的认同基础。这种转变在丁玲所写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可见：“首先得把自己的感情来一个改造。要把自己消灭，留着一个躯壳，装满了新的感情，新的感觉，新的观念。” 这里的“把自己消灭”并非真正的消亡，而是消灭那个狭隘的、个人主义的“旧我”，以容纳一个集体的、阶级的“新我”。至此，“自我实现”的内涵也随之颠倒。在莎菲那里，实现自我意味着向外索取，但在新的革命伦理中，实现自我恰恰在于“奉献”、在于“牺牲”那个小我。个人的价值是通过为集体事业的付出彰显出来的，这样的“新我”带来了一颗与人民大众共同跳动的心。提到这一阶段便不可避免的要提到丁玲在这一时间所作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篇小说中小几乎找不到一个类似莎菲或韦护那样拥有复杂内心世界的“旧我”。以主人公张裕民为例，他的成长过程是一个“阶级意识”逐渐唤醒并取代“个人意识”的过程。小说开篇的他，还有些许犹豫和顾虑，但随着斗争的深入，他越来越坚定、果断，人物性格完全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

要。他的“自我”本质上已成为“贫雇农阶级觉悟”人格化的具体体现。更值得分析的是黑妮这个形象。在最初的构思中，黑妮作为地主钱文贵的侄女，与贫农程仁相爱。这样的构思本可以造就一个极具张力的角色，展示情感与阶级立场之间的冲突以及个人爱情追求与政治环境要求的矛盾。然而在定稿中，这个角色被大大简化，其情感线索几乎被抹去，只剩下证明党的政策正确性的主要功能。“我本位”之中的“自我”至此彻底融入集体，走向“无我”。

四、张爱玲与丁玲

将张爱玲与丁玲相比较看起来是有些不伦不类的，两位作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2]笔者这里仅就两位的文学作品来说，与丁玲笔下“自我的升华”不同，张爱玲的“自我”是下沉的、紧贴生活的甚至被评价为有些世俗的。那么，将差异如此巨大的两位女作家排列在一起是合理的吗?前面提到了周扬的批判：“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从这里出发，对于丁玲早期的作品和张爱玲的作品我们是能够听见一些相似的批评的声音的，例如“小情小爱”。在历史的潮流和这样的声音下，两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丁玲最终走向了追求历史的真实，她甚至明确提出新小说必须“用大众做主人”，并几乎是最早地提出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而张爱玲执着于经验的真实，这样情形下构成的“自我”不高尚，但它存在着构成了人性最

[2] 高旭东. 丁玲与张爱玲自我救赎小说之比较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5 (10): 150-159+187-188. DOI:10.19898/j.cnki.42-1704/C.20250930.01.

基本的底子。回到“小情小爱”这一评价，无论是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在爱情中对自我感受和存在价值的追寻，还是张爱玲在《年轻的时候》从潘汝良的恋爱入手所引出的文化自卑，我们能说这些仅仅只是关于小情小爱吗？或者说“小情小爱”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傲慢的。这个世界就是由每个个人和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组成的，一切“大”的事物都建立在“小”的上面，“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比人心人情更大的东西吗？

对于前面丁玲所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中岛碧是这样写的:“但我们很希望知道，既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又不是‘飞跃的革命家’，只是往往‘犯错误’的平凡人怎样能够改造自己，很希望知道，这些平凡人该有的‘自我战斗的痛苦’的内容。将其写出来，这就是知识分子文学家的任务。”因为在她看来，“知识分子文学家”固然是“大众中的一个”，但更重要的是只有他们才是“能够认识自己的本质和存在形态，并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人” 。但这样的要求，大约是丁玲没有也不能表现的内容。[3]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丁玲持续沿着《莎菲》的路走下去，会写出怎样的作品。我们只知道，她选择了一条将个人才华毫无保留地注入历史叙事的道路。这条道路造就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史诗，也让她早期作品中那种锐利的“个人真实性”，逐渐变得模糊。

[3] 贺桂梅. 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02): 194-210.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05.02.011.

探寻丁玲文学作品中的“我本位”，我们能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作家的风格转变，更是一部缩微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从“五四”的个人主义到左翼文学中的挣扎求索再到自我完全融入革命叙事，丁玲几乎走过了现代中国作家所能经历的全部心路历程。本文的遗憾正是针对这一过程中那些不可避免的“流失”。笔者遗憾的，不是丁玲选择了信仰，这样的选择本身包含着可敬的真诚与勇气；笔者遗憾的是，在拥抱“大情怀”的历史进程中，那种将“小情小爱”视为必须克服之物的倾向，最终也弱化了文学对人性复杂的探索和更多可能性的发掘。然而，丁玲的伟大与珍贵，恰恰也在于她的“未完成性”。她从来不是一个彻底被改造的作家。即便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我们仍能依稀感受到她对黑妮这类边缘人物的潜在同情；在她晚年的言论中，我们偶尔还能听到那个独立、倔强的莎菲的回声。[4]因此，笔者在这里并不想将丁玲奉为完美的典范，更多地是想回看她的创作生涯迫，保持疑问：文学中的“自我”究竟可以有多少种形态？当我们从“唯我”走进“无我”时，我们又失去和得到了什么？

[4] 樊亚菲. “杜晚香”精神与丁玲的“无我”哲学——重读《杜晚香》 [J]. 厦大中文学报, 2025, (00): 63-76.

一些不知道怎么补充在正文的话：这篇是上学期的现代小说的期末作业，老师让写“你最讨厌的现代小说作家”。其实写完是感觉有些跑题的，我不讨厌丁玲，更多的是像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里的“恨”，不是憎恨而是遗憾。但这种遗憾好像太没来头了，所以我想要写她，所以我也想，我是“恨”她的……

匿名功臣与署名王朝：从“SHIT 期刊”现象看网络亚文化场域中的性别话语政治

作者：星之财比

摘要

2026 年初，以解构学术权威为旗帜的“SHIT 期刊”在网络爆火，引发广泛关注。然而，这一由男性创建并主导话语规则的亚文化空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性别图景：爆款稿件多由女性创作，创始人却以“兄弟们”统摄全场，面对修改建议仅作象征性调整。这一现象与历史上“杰出女性称先生”的称谓争议形成微妙的同构关系——女性需要以“杰出”才能换取与男性平等的称谓资格，在文化生产场域中“出了力却被夺走功劳”。本文以“SHIT 期刊”现象为切入点，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话语权力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分析网络亚文化空间中性别话语政治的运作机制，揭示“匿名功臣”与“署名王朝”的结构性张力。研究认为，从“先生”称谓到“兄弟们”口癖，表面是语言习惯之争，实则是符号权力的分配博弈。在网络亚文化看似“去中心化”的表象之下，传统的性别话语秩序正在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完成自我复制。

关键词：性别话语政治；网络亚文化；符号权力；称谓政治；SHIT 期刊

一、引言：一场“微妙的权力游戏”

2026 年初，一个自称“SHIT 期刊”的网络账号异军突起。它以“汉语言文学领域底刊”自居，用抽象、解构、幽默的方式“重新定义学术规则”，迅速吸引大量年轻用户。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年轻人对抗学术垄断、挑战精英话语的文化狂欢。然而，随着热度攀升，一种“微妙的感觉”开始在女性用户中蔓延：

> **“微妙的权力游戏。当主体映射口癖，那就不仅仅是一个称呼那么简单了。”**[citation: 用户的评论截图]

数据显示，爆火的“SHIT 神作”多数出自女性之手，但创始人在视频中始终以“兄弟们”招呼观众。当网友建议加上“姐妹们”时，后续视频依旧如故。即便偶有调整，也不过是将“兄弟们”改成“同志们”——仿佛性别称谓只能二者择一，从未想过“兄弟们和姐妹们”可以并存。

这种“微妙感”迅速发酵为一场关于话语权的小规模论战。有评论者敏锐指出：**“其实看到创始人我就知道了，‘他’能做成什么事，还得让她来做。”**[citation:用户的评论截图]这句话道破了问题的核心：女性贡献了内容，男性掌握了命名权；女性是“匿名功臣”，男性则坐拥“署名王朝”。

这一幕似曾相识。当我们回望关于“杰出女性能否称先生”的百年争议，会发现同样的权力逻辑：男性天然可称“先生”，女性只有“杰出”到足以与男性比肩时，才能勉强挤进这个称谓的殿堂。从杨绛、冰

心到宋庆龄，她们被称为“先生”固然饱含敬意，但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什么“敬意”必须以男性称谓为载体？为什么女性的杰出必须通过“男性化”的方式才能被确认？

本文试图将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现象——网络亚文化的“口癖政治”与历史悠久的“先生称谓争议”——并置考察，揭示其背后共同的性别话语政治逻辑。在理论层面，本文将借助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以及女性主义对“命名权”的批判，剖析“称呼何以成为权力游戏”的深层机制。

二、“SHIT 期刊”现象：亚文化狂欢背后的性别褶皱

2.1 解构的旗帜与未被解构的权力

“SHIT 期刊”的走红绝非偶然。在学术生产日益体制化、论文发表异化为“学术内卷”的背景下，它以“底刊”自居，用戏谑、解构的方式打破学术的神秘感，确实击中了年轻一代的集体情绪。正如其自我介绍所示：**“鄙刊是汉语言文学领域底刊，在称呼上，如果需要补充主语，鄙刊通常使用‘鉴友们’、‘史友们’或‘文友们’”**[citation:用户的评论截图]。这种对传统学术称谓的戏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

然而，当这种“抵抗”触及性别议题时，却暴露出耐人寻味的褶皱。创始人自始至终使用“兄弟们”作为统摄性称呼，即便在女性稿件爆火之后，即便在网友明确提出建议之后。这并非无心之失，而是一种“有选择的忽视”——解构可以指向学术权威，却不必指向自身的语言惯习；反叛可以针对体制，却不必反观内嵌于日常的性别秩序。

2.2 谁是真正的创作者？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爆火的“SHIT 神作”——那些真正击中时代情绪、引发广泛共鸣的内容——多数出自女性之手。有评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多数目前大热的稿件都是姐妹们写的，但是开口就是兄弟们，并且平静地建议是不改的，那就只能让兄弟们去投兄弟们去看了，姐妹们不如撤稿去其他姐妹们也能发刊的地方。”**[citation:用户的评论截图]

这段话道破了问题的实质：当女性创作者的内容被男性话语收编，当“姐妹们”的智慧结晶被“兄弟们”的称谓统摄，一场隐形的权力转移就此完成。女性贡献了文化资本，男性则垄断了符号权力。这不是阴谋，而是结构；不是刻意的排斥，而是习惯性的忽略——而习惯性的忽略，恰恰是权力最有效的运作方式。

2.3 “飞机舔狗游戏”：内容本身的性别症候

除了称谓问题，**“SHIT 期刊”的内容取向同样值得玩味。有网友指出，刊文一部分“可以达成飞机舔狗游戏排列组合成就”**[citation:用户的评论截图]，另一位则直言：**“SHIT 主页有大量文章给人的感觉就**

像走进男厕所，如果想长久运行下去必须仔细思考分区和审核了，幽默解构不是低俗烂梗。。。”[citation:用户的评论截图]

“走进男厕所”——这个比喻精准捕捉了女性用户在其中的体验：她们可以进入这个空间，但会感到不适；她们可以参与内容生产，但必须接受既定的话语规则。所谓“飞机舔狗游戏”，无非是男性视角下对两性关系的某种想象性建构。当这种建构成为内容生产的“主流”，女性创作者便面临两难：要么迎合这套话语以获得认可，要么坚持自己的表达而被边缘化。

这正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它不是赤裸裸的压迫，而是通过塑造“何为好内容”“何为幽默”“何为解构”的审美标准，让被支配者自愿接受支配。女性创作者并非被禁止发声，而是被引导去生产符合男性审美的话语；她们并非没有选择，但任何选择都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之内。

三、称谓政治学：“先生”与“兄弟们”的百年同构

3.1 “先生”的语义嬗变：从无性别到性别化

要理解“SHIT 期刊”现象的历史纵深，有必要回溯“先生”这一称谓的百年演变。历史学者潘若天在《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一文中详细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嬗变轨迹：在传统中国的语言实践中，“先生”最初并无性别色彩。《诗经》中的“先生如达”指“首生”，《论语》中的“先生馔”指父兄或长辈。自汉至清，“先生”可以指称老师、医生、道士、说书人等职业，无论男女皆可使用[3-7]。

然而，19 世纪中期以降，西方汉学家将“mister”与“先生”建构起互译关系，性别因素开始悄然“寄生”于“先生”概念之中。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港澳台用语的回流，“先生”逐步“成了对男性公民的第一位的称呼语”[7]。至此，“先生”完成了从“无性别尊称”到“男性专用称谓”的语义转型。

这一转型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先生”成为男性专属后，它又以“尊称”的名义回旋到杰出女性身上。于是便有了杨绛先生、冰心先生、宋庆龄先生——她们是“例外”，是“杰出者”，是“足以与男性比肩的女性”。但问题的本质恰恰在于：为什么女性必须“杰出”才能获得一个男性的称谓？为什么男性可以天然享有这个称谓，而女性需要用一生的成就去“挣得”它？

3.2 “杰出”的门槛：不平等的平等

这种“男性称谓女性化使用”的悖论，在“SHIT 期刊”现象中以另一种形式重演。女性创作者同样需要“杰出”——写出爆款神作、获得广泛认可——才能进入这个场域。但即便如此，她们依然无法获得平等的符号地位。创始人开口闭口“兄弟们”，仿佛那些贡献了爆款的女性根本不存在，仿佛这个空间的“默认用户”永远是男性。

这正是“称谓政治学”的核心秘密：称谓从来不只是称谓。它是权力的分配机制，是可见性的分配机制，是谁被看见、谁被忽略的分配机制。当“兄弟们”成为统摄性称呼，女性的存在便被语言抹去；当女性创作者需要以“杰出”才能被看见，而男性参与者天然被看见，这种“不平等的平等”便完成了对性别秩序的双重维护。

3.3 从“先生”到“兄弟们”：话语权力的微观运作

从“杰出女性称先生”到“SHIT 期刊喊兄弟”，表面看是两件不同的事，实则共享同一套话语逻辑：

第一，**男性作为“默认人类”的假定**。在“先生”的语义转型中，男性成为称谓的默认主体，女性需要“加注”才能进入；在“兄弟们”的日常使用中，男性同样被视为受众的默认主体，女性需要“额外提醒”才能被看见。

第二，**女性成就的“男性化确认”机制**。杨绛被称为“先生”，是因为她的成就“配得上”这个男性称谓；女性创作者的作品在“SHIT 期刊”爆火，是因为它们符合了既定的（男性主导的）审美标准。在这两种情况下，女性价值的确认都需要经过男性中介。

第三，**符号权力的不对称分配**。男性掌握命名权，女性争取被命名权；男性设定话语规则，女性在规则内博弈。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给定的能力”，是“让人们看见和相信的权力”[citation:需要补充来源]。从“先生”到“兄弟们”，这种构建的权力始终掌握在男性手中。

四、女性创作者的矛盾处境：匿名的功臣与被看见的斗争

4.1 从“匿名到“署名”：女性文化生产的千年困境

女性在文化生产中的“匿名功臣”处境，绝非网络时代的发明。艺术史学者琳达·诺克林在 1971 年提出那个著名问题：“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她的回答是：不是因为女性缺乏天赋，而是因为她们被制度性地排除在艺术训练、艺术市场和艺术评价体系之外。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女性艺术家的处境同样艰难。元代管道昇因丈夫赵孟頫的权势才有机会创作文人画，却被视为“闺阁之作”；清代陈书的《历代帝王道统图》技法精湛，却因涉及公共历史叙事而被认为“不合规矩”。她们的作品流传下来，但她们的名字常常被遗忘；她们贡献了艺术，但艺术史的正典中少有她们的位置。

这种“匿名功臣”的困境，在“SHIT 期刊”现象中以新的形式重现。女性创作者贡献了爆款内容，但聚光灯打在了创始人身上；她们的名字出现在评论区，但创始人的账号成为品牌；她们是内容的实际生产者，但话语规则由男性设定。技术变了，平台变了，但权力结构何其相似。

4.2 被看见的斗争：女性用户的发声与博弈

值得关注的是，面对这种结构性忽视，女性用户并未沉默。从截图中的评论可以看出，她们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所在，并以多种方式展开博弈：

有人直接指出问题：**“开口就是兄弟们，并且平静地建议是不改的”**。有人发出行动倡议：**“姐妹们不如撤稿去其他姐妹们也能发刊的地方”**。有人进行理论提炼：**“微妙的权力游戏。当主体映射口癖，那就不仅仅是一个称呼那么简单了”**。还有人提供历史纵深：**“真的每次看到这种都觉得他们真的很团结（贬义）在这种话语环境塑造上”**[citation:用户的评论截图]。

这些评论本身就是一种“被看见的斗争”。她们没有被动接受“兄弟们”的统摄，而是以话语回应话语，以批评介入场域。即便改变尚未发生，即便创始人依旧故我，但这种发声本身已经打破了“沉默的共谋”——它让权力运作被看见，让习惯性的忽略被指认。

4.3 “让他去做，还得让她来做”：贡献与归属的错位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句评论：**“其实看到创始人我就知道了，‘他’能做成什么事，还得让她来做”**[citation:用户的评论截图]。这句话道破了女性创作者的复杂心绪：一方面，她们深知自己的贡献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她们也清醒地看到，功劳的归属与贡献的分布并不匹配。

这种“贡献与归属的错位”，是性别话语政治的典型症候。女性可以“做事”——生产内容、贡献创意、制造爆款——但“做成什么事”的命名权和归属权，往往掌握在男性手中。于是便有了这样的悖论：女性是内容的实际生产者，但男性是话语规则的制定者；女性创造了价值，但男性主导了价值的分配。

五、话语政治的理论透视：从“口癖”到权力结构

5.1 福柯与布尔迪厄：话语即权力，称呼即秩序

为什么一个“称呼”值得如此大费周章地讨论？为什么“兄弟们”三个字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应？福柯的话语理论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钥匙：话语不只是言说，它是“系统地形成它们所谈论的对象”的实践。换言之，语言不只是反映现实，它还在建构现实。

当创始人反复使用“兄弟们”，他不仅在称呼观众，还在建构观众——将这个空间的“默认用户”建构为男性。女性的存在没有被否认，但被边缘化；她们没有被禁止进入，但被设置为“例外”。这正是话语权力的精妙之处：它不需要禁令，只需要默认设置；它不需要排斥，只需要习惯性忽略。

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概念同样具有解释力。符号权力是**“通过言语构建给定的能力”，是“让人们看见和相信，确认或改变世界观的权力”**[citation:需要补充来源]。当创始人以“兄弟们”统摄全场，他就在行使这种符号权力——他定义了谁是“我们”，谁是“默认用户”，谁值得被提及。女性用户感到“微妙的不适”，正是因为她们感受到了这种定义权的运作。

4.2 “口癖”何以成为政治？

“口癖”通常被视为个人语言习惯，似乎不值得上纲上线。但“SHIT 期刊”现象的启示在于：正是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语言习惯，往往承载着最深层的社会结构。当一个人下意识地说出“兄弟们”而不是“姐妹们”，这恰恰暴露了他心中“默认人类”的形象。

语言习惯不是中性的。它们内化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又以“自然”“习惯”的名义将这种秩序再生产出来。正如女性主义语言学家所指出的，语言不仅反映性别不平等，它还参与建构性别不平等。当“男性通称”（如“兄弟们”统摄男女）被视为理所当然，女性的语言可见性就被系统性削弱；当“先生”成为尊称的代名词，女性就需要以“杰出”才能获得这个称谓——而这些，都以“语言习惯”的名义静默运行。

4.3 结构性的“团结”：男性话语同盟的隐性运作

有评论者敏锐地观察到：**“真的每次看到这种都觉得他们真的很团结（贬义）在这种话语环境塑造上”**[citation:用户的评论截图]。这句话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男性在话语环境塑造上的“团结”，往往不是有意识的共谋，而是结构性的同谋。

不需要开会讨论，不需要协调行动，无数男性个体在各自的语言实践中共同塑造了“以男性为默认主体”的话语环境。今天你用“兄弟们”招呼全场，明天他用“先生”尊称女性，后天另一个男性在某个角落重复同样的语言惯习——没有人刻意组织，但效果却惊人的一致。这种“无意识的团结”，恰恰是话语权力最有效的运作方式。

六、网络时代的性别政治：新媒介，旧脚本？

6.1 “去中心化”的迷思：技术赋权与权力复归

互联网曾被寄予“去中心化”的厚望。人们相信，新技术将打破传统的话语垄断，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发声。“SHIT 期刊”本身正是这种想象的产物——它以解构权威、挑战精英为旗帜，似乎代表了年轻一代对抗体制的文化实践。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去中心化”并未必然带来“去父权化”。在反抗一种权力（学术权威）的同时，另一种权力（性别话语权）被悄悄保留。创始人对学术体制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但对自身语言惯习的反思却付之阙如。这种现象提示我们：反叛并不天然具有解放性，它可能只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而非权力的真正消解。

6.2 女性策略：从“进入场域”到“改造场域”

面对这种结构性困境，女性创作者正在探索多种应对策略。有人选择“发声批判”——直接指出问题，要求改变话语规则。有人选择“退出博弈”——撤稿转投他处，用脚投票表达不满。还有人选择“另起炉灶”——创建女性友好空间，探索替代性话语实践。

这些策略各有短长，但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女性应该满足于“进入”既定的游戏，还是应该致力于“改造”游戏的规则？如果只是进入，那么即便获得成功，也不过是在男性设定的框架内成功；如果拒绝进入，又可能错失改变的可能性。这种两难，正是女性在每一个文化场域中都要面对的根本困境。

6.3 从“被命名”到“自我命名”：话语自主的可能路径

从“先生”争议到“SHIT 期刊”现象，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命名权”的争夺。谁有权命名？谁被命名？以何种方式命名？这些看似微末的问题，实则是文化权力的核心。

“先生”之争的实质，是女性能否拒绝“以男性称谓被尊称”的悖论，寻求自我命名的可能。“兄弟们”之争的实质，是女性能否在被统摄之外，获得独立的语言可见性。这两场斗争的共同指向，是从“被命名”走向“自我命名”——不再接受男性设定的称谓框架，不再满足于在既定规则内博弈，而是积极参与话语规则的制定。

这种话语自主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持续的发声，需要策略性的博弈，需要理论的支持，也需要实践的积累。但“SHIT 期刊”现象至少表明：新一代女性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并且不再将其视为“小事”。当“口癖”被指认为“权力游戏”，当“称呼”被读解为“话语政治”，一种新的意识正在觉醒。

七、结语：谁在书写，谁在署名？

“SHIT 期刊”现象是一个缩影。它折射出网络亚文化空间中的性别权力结构，也映照出历史悠久的“匿名功臣”困境。从“杰出女性称先生”到“爆款神作出自女性之手却被‘兄弟们’统摄”，两件事跨越百年，却共享同一套逻辑：女性贡献了价值，男性垄断了署名；女性是匿名功臣，男性是署名王朝。

这并非一场“性别战争”，而是关于文化生产场域中符号权力的分配之争。当创始人以“兄弟们”招呼全场，他行使的是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权力”——定义谁是“我们”，谁值得被看见，谁占据话语中心。当女性用户指出这种“微妙的权力游戏”，她们争取的是参与定义的权利，是改变默认设置的可能，是从“被命名”走向“自我命名”的通道。

“SHIT 期刊”自称要“重新定义学术规则”。但真正深刻的重新定义，应当始于反思自身的语言惯习，始于审视那些被视为“自然”的权力关系，始于打破“匿名功臣”与“署名王朝”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否则，一场以解构为旗帜的狂欢，最终不过是权力的又一次自我复制——只不过，这一次复制得更加隐蔽，也更加“微妙”。

当我们问“谁在书写”时，答案常常是女性；当我们问“谁在署名”时，答案常常是男性。这一错位，既是“SHIT 期刊”现象的核心议题，也是性别话语政治的根本悖论。揭示它，指认它，改变它——这是学术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写作者的责任。

八、尾声：从“SHIT”到“Shift”——一次集体的命名与邀请

在这场关于话语权力的讨论逐渐深入之时，一群看到问题的姐妹——以及认同这一议题的伙伴——选择将批判转化为行动，创建了账号【Shift 刊见】。

“Shift”，是转变，是切换，是那个常常被忽略却能改变输入状态的按键。我们以此喻示一种话语状态的转换：从男性预设的叙事惯性，转向更具性别自觉的书写实践；从“匿名功臣”的结构性困境，转向“共同署名”的集体尝试。“刊见”，则是让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声音被看见。

在此，我们向每一位为这个账号的创建付出心力、为女性主义思考添砖加瓦的姐妹致以诚挚的谢意。你们的敏锐、坚持与创作，本身就是对“匿名功臣”宿命最有力的反驳。也要感谢那些愿意加入讨论的男性朋友，留意自己的“口癖”，本身就是参与秩序重构的开始。

从“SHIT”到“Shift”，不只是一次命名的更迭，更是一场权力游戏规则的重新审视。正如那位网友所言：**“微妙的权力游戏，当主体映射口癖，那就不仅仅是一个称呼那么简单了。”**

那么，就让我们从改变“口癖”开始，从让每一个贡献者都能以自己的名义被看见开始。

【Shift 刊见】，期待你的来稿，更期待你的“看见”。

九、致谢：

感谢每一位为 Shift 刊见建设和女性主义添砖加瓦的姐妹

我们，可以转变叙事，改写规则！

姐妹们，按下 Shift 键，我们将世界重新启动！

参考文献

[1] 潘若天.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性别视域下“先生”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迁[J].妇女研究论丛,2024(2). -3-7

[2] 诺克林.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M]//女性艺术与权力.1971. -4

[3] 布尔迪厄.语言与符号权力[M].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

[4] 福柯.知识考古学[M].伽利马出版社,1969.

[5] 陶咏白,李湜.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4

[6] 澎湃新闻.把杰出女性称“先生”，到底是不是一种尊重？[EB/OL].2024-12-10. -5

[7] 中国作家网.女性何以不宜称“先生”？[EB/OL].2024-11-28. -3

[8] 浙江日报.破界·共生：女性艺术家的生存诗学与生命叙事[N].2025-03-08.

论哈利·波特为什么骑着扫帚到处飞

摘要：研究以《哈利·波特》系列文本与影视为核心，采用文本研究法、电影观看法、文献研究法等，系统讨论哈利·波特长期使用扫帚出行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哈利·波特骑扫帚并非单纯个人爱好，是与学院集体荣誉感、生存安全、身份构建、剧情叙事逻辑与经济成本等共同决定的。因技术、资金、社会原因，未能去到环球影城使用身临其境法作其研究，这是不足之处。

关键词：哈利·波特；飞天扫帚；魁地奇；魔法交通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 J.K.罗琳构建的魔法世界观中，飞天扫帚是普及率最高、出镜率最强的个人飞行工具。主角哈利·波特自霍格沃茨一年级起，便频繁以骑扫帚的方式完成上课、比赛、逃亡、侦查、救人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贯穿七部正传与多部衍生作品。现有研究多将哈利骑扫帚归因于飞行天赋、魁地奇、逃生等，面对“为什么不幻影移形”“为什么不骑夜骐”“为什么不用门钥匙”“为什么不用飞路粉”等灵魂拷问，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解释框架。

1.2 研究方法

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和文本细读法。

文本细读法，以《哈利·波特》原文为研究对象，选取叙事转折点，关注叙事中的重复性符号，进行逐段、逐场景的微观拆解。文献研究法即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和整理，查找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力图得出科学的结论、形成正确的认识，运用文献资料对自己的研究做出贡献，将关注与本研究两大相关文献：其一，通过芋泥哈啵啵、唱唱反调、巴克鲁比克山等博主研究文献与本研究结合，这类文献较有综合性；其二，比对与本研究有高关度性“魔法扫帚”“魔法工具”等现有学术成果等，以此精准把握研究现状并明晰本研究的对话空间与创新立足点。

二、哈利·波特持有扫帚

2.1 哈利波特扫帚如何得来

众所不周知，一个人使用某个物品的前提，是这个人得拥有这件物品，而哈利·波特在整部作品中主要用过两把扫帚。第一把光轮 2000，是哈利在一年级时由米勒娃·麦格教授赠送，后被打人柳打碎；第二把火弩箭，由教父小天狼星·布莱克匿名赠送，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快、最顶级的扫帚，学年结束哈利才知道是小天狼星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后被乌姆里奇没收，后又被找回。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老师老师，为什么德拉科没有火弩箭呀，因为德拉科有妈妈爸爸，火弩箭时速可达高铁速度，德拉科说要买火弩箭，在他母父耳里可能是“妈妈爸爸”我要去送死了。

2.2 哈利·波特为什么会得到扫帚

哈利有飞行天赋，飞行课上，哈利为抢回纳威的记忆球，展现惊人飞行天赋，被麦格当场破格招入格兰芬多魁地奇队当找球手（百年最年轻），麦格特批，自掏腰包给哈利买了当时的竞赛扫帚。再者，魁地奇比赛需要扫帚，没有扫帚哈利只能当个走地鸡了，哦不赛场都不会让他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爱，是无法言说的爱，所以麦格和小天狼星给哈利买了扫帚。

三、魔法世界出行工具对比与扫帚核心优势分析

3.1 主流飞行工具性能对比

本研究将从工具类型、速度、隐蔽性、未成年使用权限、便携性、成本和安全系数，各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飞天扫帚，速度中-高，隐蔽性极高且允许未成年使用，便携性高，成本低到中，安全系数中高。幻影移形，速度极高，隐蔽性也高但禁止未成年使用，便携性和成本暂无，但安全系数极低有分裂风险，且前期投入多也不一定学会。夜骐等其他会飞动物，其他咱不多说，便携性极低，直接 pass。门钥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能打的，但隐蔽性低且有严格管制，飞毯常被中东等地巫师使用，在英国是被魔法部禁止的，飞路网是巫师界最重要的瞬移传送手段，但便携性低。本研究仅比对可私人化出行手段，骑士公共汽车、霍格沃兹特快列车等暂未统计。

3.2 扫帚的不可替代性

霍格沃茨开设飞行课，扫帚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未成年可自由使用的飞行道具。幻影移形对未成年人明令禁止，门钥匙需魔法部审批，飞毯在英国属违禁品，飞天扫帚合规性可谓拉满。且扫帚外观与麻瓜清洁工具一致，随手靠墙角、塞柜子即可完美伪装，不触发麻瓜怀疑，严格遵守《国际巫师保密法》。一句“Up”即可召唤，无需咒语、无需审批、无需组队，单人即可操作，全地形适配小巷、城堡、禁林、湖面均可起降，适合偷袭、逃跑、追金色飞贼。

四、巫师都爱飞为什么哈利格外爱飞

4.1 保命

无论是在校内违反校规还是校外被伏地魔追杀，扫帚具备瞬时发动、快速撤离、低空隐蔽等三大保命属性，如果开的是罗恩爸爸的改造汽车，都不用内鬼报位置了，那轰隆隆声响直接在说“伏地魔我在这哟！快来抓我吧嘻嘻”，最最最重要的是，，原著有七个波特逃亡事件，扫帚几乎每个巫师都会骑，如果是骑夜骐，将会出现以下对话：我去！我看不见！如果使用飞路网将会出现：壁炉在哪？什么你家飞路网到期了？续费啊！

4.2 身份、集体与认同

哈利一年级即展现顶级飞行天赋，破格入选格兰芬多魁地奇队担任找球手，扫帚是哈利建立巫师自信的核心符号，魁地奇为哈利带来声望、友谊与学院荣誉，骑扫帚成为其个人标签，形成“飞行—认同—更爱飞行”的正向循环。

五、讨论

5.1 骑扫帚硌屁股，为什么不换舒服的工具？

法世界存在舒适咒、减震咒，可解决物理不适；且机动性与隐蔽性优先级远高于乘坐舒适度，属于生存理性压倒感官体验，最重要是，死到临头也管不了那么多。

5.2 整个魔法界都乱套了，为什么还管幻影移形违法？

杀人都不违法了，哈利使用幻影移形违不违法坐不坐阿兹卡班都不重要，幻影移形看似高效，实则不适用于未成年巫师。根据魔法世界法律，未成年人严禁学习与使用幻影移形，由此可得哈利几乎没有学习使用过幻影移形，难度大大提高，同时，幻影移形存在空间分裂风险，安全性极低，又极易被魔法部追踪，不利于隐蔽行动与逃生。相较之下，扫帚属于魔法物品而非施法行为，不触发魔法监控，合规、安全、可低空飞行、便于隐藏，因此在实用性上远优于幻影移形。

5.3 哈利只是个学生，凭什么有特权能拥有顶级扫帚？

哈利获得扫帚并非特权，他飞行天赋突出，具备使用高端扫帚的能力基础，麦格教授破例将一年级哈利纳入校队，是综合考虑了哈利各方面身体素质，与她后续赠给赫敏时间转换器原因类似，并无特钱可言，作为霍格沃茨百年以来最年轻的魁地奇找球手，他承担着学院比赛的关键任务，学校为体育特长生提供装备支持属于正常制度安排。同时，哈利后续火弩箭则来自亲属赠予，属于私人情感表达，并非学校额外优待，哈利拥有扫帚具备充分合理性，并

非无依据的特权。

六、总结

哈利·波特骑着扫帚到处飞，是制度约束、安全需求、身份建构、经济理性、剧情设定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无逻辑的个人偏好，飞天扫帚以合规、隐蔽、便携、低成本、高机动的综合优势，成为哈利在复杂魔法世界中的最优出行选择，是其少年巫师生涯的标志性行为。本研究未纳入哈利成年后的交通行为变迁，未进行扫帚型号与飞行效率的量化建模，未来可开展《火弩箭动力学分析》《成年哈利交通方式转型研究》等延伸课题，进一步完善魔法交通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 J.K.罗琳. 《哈利·波特》系列文本[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2]马尔福那么有钱为什么不给德拉科买火弩箭[J].圣吉列斯.小红书.2025.
[3] 霍格沃茨教务处. 霍格沃茨飞行课教学大纲与安全规范[S]. 霍格沃茨档案馆, 1991.
[4] 魔法部魔法交通司. 国际巫师保密法·飞行行为管控条例[S]. 英国魔法部, 1692.
[5]哈利波特中“交通工具”全览[J]不吃蛋黄.小红书.2025.

从战场到厨房:《使命召唤》乙女向同人创作中的东方主义流变、权力重构与隐性反战

From Battlefield to Kitchen: The Orientalist Evolution, Power Reconfiguration and Implicit Anti-War in "Call of Duty" Focused on Female Fans' Fan Fiction

摘要:本文以《使命召唤》系列游戏衍生的乙女向同人创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及日常生活政治视角,探讨中国女性创作者在挪用西方军事叙事文本时所呈现的文化政治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这类创作隐含着一种非自觉的反战话语——通过对战争创伤的日常化呈现、对“后方”价值的重估,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具身化想象,它们在宏大叙事的缝隙中构建了一个微观的情感政治空间。

关键词:使命召唤;乙女向同人;东方主义;权力重构;日常政治;反战

一、引言

在《使命召唤》系列构建的叙事体系中,“141 特遣队”的成员们是西方军事神话的典型化身——他们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在全球化战场上面对抗形形色色的敌人,以暴力手段维系着某种被预设为正义的世界秩序。然而,在中文互联网的隐秘角落,这些硬汉形象正经历着一场始料未及的“转世”:在小红书、AO3 等平台上,大量中国女性创作者以这些西方男性角色为对象,书写着与他们恋爱、共同生活乃至组建家庭的“梦女文”。

这一文化现象的内在张力显而易见:一方面,创作素材本身携带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基因;另一方面,创作者身处东方文化语境,且其书写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原文本的“挪用”与“重写”。当中国女性拥抱西方军事角色时,她们究竟是在延续某种文化上的臣服,还是在开辟一种全新的抵抗空间?当这些角

色从“战场”被拉回“厨房”，从“持枪者”变为“煮饭人”时，又意味着怎样的权力重构?

本文尝试从几个具体的文本特征切入，探讨这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这类创作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而是试图呈现其中交织的多重逻辑，以及这些逻辑在具体叙事中的复杂运作。

二、〝娇小东方女性〞：符号的借用与改写

在《使命召唤》乙女向同人创作中，Y/N（Your Name，读者代入角色）的形象呈现出高度稳定的类型化特征：她通常被设定为黑发、黑眼的东方女性，身材娇小，与身高近一米九的西方男性角色形成鲜明的视觉反差。这一设定的普遍性令人瞩目——它几乎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默认选项”，以至于很少被读者质疑其合理性。从东方主义理论视角审视，这一形象无疑带有浓厚的符号意味。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揭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往往被塑造成阴性的、柔顺的、等待被言说和征服的“他者”。“娇小东方女性”恰恰是这套符号系统的直观呈现：她的身体被编码为一种可欲的差异性，其存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系于与西方男性的对比关系。当这一形象被中国创作者挪用至同人文本时，表面上完成了一次凝视主体的转换——东方女性从“被看者”变为“书写者”——但凝视的对象和符号本身却似乎未被触动。

然而，仅止于此的解读可能失之简单。首先，从叙事功能的角度看，“娇小”与“高大”的反差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修辞策略，它能够在视觉层面迅速建立人物关系的基本张力，激发读者的想象与情感投射。这一技巧层面的考量与意识形态无涉，却可能在无意识中强化了某种审美定式。更为关键的是，角色的“外形设定”与“功能设定”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在这些文本中，Y/N 尽管外形“娇

小”，却极少被塑造成被动等待拯救的客体。相反，她往往承担着核心的情感功能：洞察男性角色的内心创伤，提供精神上的接纳与抚慰，在对方陷入自我怀疑时成为稳定的情感锚点。换言之，外形上借用的是东方主义的符号，内核上完成的却是对它的置换——Y/N 的“弱小”是物理层面的，而她在情感关系中的位置，恰恰是主动的、强大的、不可或缺的。

这种“外形与功能的分离”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文化政治。它既不是纯粹的抵抗，也不是简单的臣服，而是一种“策略性的借用”：创作者从既有符号库中选取可用的素材，却在具体叙事中赋予其新的功能和意义。这种实践类似于德塞托所说的“盗用”——弱者无法创造自己的语言，却可以在既有的语言系统中“以不同的方式说话”。

三、凝视的倒置：武力保护与心理治愈的权力逻辑

如果说 Y/N 的外形设定尚残留着东方主义的痕迹，那么“武力保护与心理治愈”这一核心情节模式则更清晰地呈现出权力关系的翻转。

大量文本呈现出如下叙事结构：男性角色凭借其特种兵身份和身体素质，在危险情境中保护 Y/N 的人身安全；而 Y/N 则在日常相处中，以情感陪伴和心理疏导的方式，治愈男性角色因战争经历留下的精神创伤——PTSD、失眠、自我认同危机、亲密关系障碍等。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复刻：男性负责“外部安全”，女性负责“内部情绪”。然而，细察这一结构的权力逻辑，便会发现其中暗含着深刻的倒置。

关键在于两种“保护”的性质差异。武力保护解决的是肉体的安全，其价值取决于危险情境的存在；一旦外部威胁消失，这种保护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心理

治愈则不同——它所处理的是人格深层的问题，其意义不因情境变化而消减，甚至恰恰在脱离战场后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愈发重要。在许多文本中，男性角色在退役后、在远离战场的平静生活中，才真正面对自己的创伤；而此时能够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正是 Y/N 的情感陪伴。

这种结构实际上完成了一种“价值的重估”：在战争叙事中被视为核心的武力，在亲密关系的逻辑中沦为边缘；而原本处于“后方”的情感劳动，却被证明是支撑一个人长久生活的根本。男性角色对 Y/N 的依赖，不是短暂的、情境性的，而是关乎存在本身的：他们需要的不是被保护，而是被接纳；不是安全的保障，而是意义的确认。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构成了一个“情感地缘政治”的微缩模型。在现实世界，西方军事力量在全球投射的是武力与霸权。但在这些文本中，这种武力被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自东方的、名为“爱”与“家”的力量——给“驯服”了，并被纳入了东方的日常秩序之中。同时，长期以来，在情感叙事上，我们习惯了“西方拯救东方”（如《蝴蝶夫人》《西贡小姐》）。但在这些同人文里，西方男性角色不再是拯救者，他们甚至需要东方的“家”和东方的“她”来获得内心的安宁。他们从“征服者”变成了“归家人”。这是一种情感层面的“去殖民化”。

从承认政治的角度看，这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承认逻辑的转换”。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自我意识需要在另一个自我意识那里获得承认，才能确立自身的存在。在传统战争叙事中，这些角色获得的承认来自军队系统、来自战友、来自国家——它们以“英勇”“牺牲”“完成任务”为尺度，本质上是一种将个体工具化的承认。而在同人文本中，Y/N 提供的承认是另一种性质的：它不是对某种功能的认可，而是对个体本身价值的确认。“你值得被爱”与“你是个好士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承认话语，而前者恰恰是战争叙事所无法提供的。同时，Y/N 也得到了另外的承认：不再是“你是个好女人/好伴侣”（符合社会规范），

而是“你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治愈我、让我愿意为你改变”。这是一种对“主体性”的最高确认。这种双向的、基于情感本质而非社会角色的承认，构建了一个哲学的“异托邦”——一个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却在文字中真实存在的理想关系空间。

这一倒置具有双重的解构意义。一方面，它解构了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看似需要保护的 Y/N，实际上占据着情感高地和道德权威；另一方面，它解构了战争叙事本身——那些在战场上无所不能的英雄，在亲密关系中却显得脆弱甚至无能，这暗示着战争所定义的“强大”可能只是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强大。

四、从战场到厨房：日常空间的权力重构

如果说“治愈”情节尚停留在精神层面，那么“日常向”文本则将这场权力游戏延伸到了最私密的领域——家庭空间。在许多同人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情节模式：那些在战场上冷酷无情的特种兵，退役后或休假期间主动承担起家务劳动，为 Y/N“洗手作羹汤”，学习适应日常生活的节奏。

这种情节设置看似只是“甜宠”模式的延续，实则涉及更为根本的权力问题。传统父权制秩序的根基之一，是对公私领域的严格划分：男性被指派到公共领域（战场、职场、政治），女性被局限在私人领域（家庭、育儿、情感劳动）。男性在公共领域创造价值，女性在私人领域提供服务——这一划分构成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基础。

同人文中“特种兵做家务”的叙事，恰恰是对这一划分的双重颠覆。首先是空间层面的颠覆：那些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男性，主动进入了传统上被视为“女性领地”的私人空间，并且不是以“主人”的身份，而是以“服务者”的身份。

其次是价值层面的颠覆：在这些文本中，衡量一个男性角色是否“好”的标准，不再是他在战场上完成了多少任务、杀死了多少敌人，而是他能否照顾好 Y/N 的日常生活、能否在平凡琐事中表达关心与爱意。

这种颠覆的意义需要放在原作叙事的背景下才能充分显现。《使命召唤》系列游戏本质上是一种战争神话的生产机器，它不断强化着“战场才是真正的世界”的信念——在那里，生死攸关，意义重大，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全局。而日常生活在战争叙事中是没有位置的——它只是等待被保卫的对象，是英雄偶尔回归的港湾，其本身不具有叙事价值。同人文本将日常空间置于中心，恰恰是对这种价值等级制的倒转：那些在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琐事——做饭、买菜、聊天、依偎——被赋予了与战场同等甚至更高的意义。

“将她宠得像个小女孩”这类表述，在这种语境下也呈现出复杂的含义。它既可能被解读为一种对女性独立性的剥夺（将成年女性“儿童化”），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亲密关系某种理想状态的想象：在这种状态中，个体被允许暂时卸下社会角色的重负，展露最柔软甚至幼稚的一面。后者正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安全基地”功能——当一个人确信自己处于绝对安全的关系中时，她可以安心地“退行”，不必时刻保持成年人的防御姿态。[6]从这个角度看，“被宠成小女孩”不是权力的剥夺，而是安全的证明。

五、隐性反战话语：情感政治中的和平想象

将上述分析置于当今全球冲突频发的背景下，一个此前未被充分注意的维度逐渐浮现：这些以军事游戏为素材的同人创作，是否隐含着某种反战主义的意涵？从文本特征来看，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反战不是显性的、宣言式的，而是

隐性的、渗透在叙事肌理之中的。它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呈现：

第一，战争创伤的日常化呈现。在原作游戏中，角色的创伤往往是英雄叙事的“燃料”——失去战友的痛苦被转化为复仇的决心，精神创伤被塑造成角色深度的证明。而在同人文本中，这些创伤被“去崇高化”了：它们不再是英雄勋章，而是需要被认真对待、需要时间治愈的伤口。文本不厌其详地描写角色如何被噩梦惊醒、如何对特定情境产生应激反应、如何因无法表达情感而陷入痛苦——这些描写将战争的后果从宏大叙事中剥离出来，还原为具体个人所承受的、持续终身的代价。当读者通过这些细节感受到战争在人的灵魂上留下的刻痕时，她便已站在了某种反战的立场上——不是反对某个具体的战争，而是反对战争本身，因为它使人无法好好生活。

第二，“后方”价值的重估。在战争叙事中，前线永远高于后方，战斗永远高于等待。同人文本则彻底翻转了这一等级秩序。那些在厨房里等待的人、在深夜倾听的人、在角色陷入自我怀疑时轻轻说“没关系”的人——她们的存在被证明是支撑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继续活下去的关键。这种对“后方”价值的重估，实际上是对战争逻辑的根本质疑：如果真正让人感到活着意义的，是家里的一碗热汤而非战场上的胜利，那么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

第三，和平生活的具身化想象。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是那些完全剥离战争背景的“日常向”文本。在这些故事里，角色已经退役，战争成为模糊的背景甚至被完全遗忘，叙事焦点完全集中在他们与 Y/N 共同营造的日常生活上——在平常而安静的早上做饭，在周末的公园里散步，在超市里为选什么食材而纠结。这种想象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具身化：它假设这些本应为战争而存在的身体，可以被重新安置在和平的日常之中；这些被训练为杀戮机器的双手，可以学会切菜、揉面、摆盘。它传递的信息是：这些人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战话语几乎完全不依赖任何政治表态。它不是通过呼

吁“不要战争”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呈现“如果没有战争，这些人可以如何幸福地生活”来完成的。这是一种属于普通人的、日常的、通过情感想象来实现的反战。在当今全球冲突不断的背景下，当一个中国创作者认真地书写一个俄罗斯角色（如 Nikto）或一个英国角色（如 Ghost）的内心世界，想象他们与 Y/N 共度的平凡时光时，她实际上在进行一种超越地缘政治的情感连接。在这些文本中，那些角色不是“潜在敌人”，不是“对方阵营的符号”，而是可以被理解、被爱、被想象为家庭一分子的具体的人。这种连接在意识形态划下界线的时代，悄悄地完成着情感的“越界”。

六、结语：暧昧的文化政治与不可化约的剩余

行文至此，或许需要承认：本文试图分析的这些文本，其文化政治远比理论框架所能捕捉的更为复杂。

它们身上确实残留着东方主义的痕迹——Y/N 的“娇小东方女”形象很难完全与东方主义的符号系统撇清关系。它们在许多方面也延续着通俗言情叙事的套路——包括那些可能被批评为“甜宠”“玛丽苏”的模式。它们对西方男性角色的迷恋，有时也呈现出某种“逆向崇拜”的色彩。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无法回避。

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这些文本也确实在完成着某种翻转：它们让被凝视者成为凝视者，让被书写者成为书写者；它们把那些被宏大叙事塑造成英雄的人，重新还原为会受伤、会脆弱、需要被好好对待的普通人；它们在战争神话的缝隙中，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不是征服，而是照料；不是牺牲，而是陪伴；不是宏大使命，而是日常幸福。

或许，这正是这类创作最值得玩味之处：它们不是纯粹的抵抗，也不是纯粹的臣服，而是一种暧昧的、混杂的、充满内在张力的文化实践。借用霍米·巴巴

的概念，它们占据的是一个“第三空间”——在这里，原文本的权威被消解，新意义的生成成为可能，但旧痕迹也依然残留。这种混杂性不是缺陷，恰恰是文化杂交状态的真实写照。

那些写下这些故事的作者们，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种意义的生产：她们在告诉自己和读者，那些宏大的叙事——战争、冲突、大国博弈——都很重要，但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事，是具体的人如何在具体的日常中彼此善待。这或许就是这些文本最终想说的话。也是所有理论分析最终不得不承认的那个不可化约的剩余。

参考文献

[1] 萨义德，爱德华·W.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先刚，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 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 邹韵，薛梅，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4]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

[5] 小红书 #cod 乙女向 标签内容，2025-2026

[6] AO3《使命召唤》同人作品库[DB/OL]. 标签“König/Reader”“Ghost/Reader”等，2023-2025.

我是导师的狗：即时通讯情境中的学生犬性进化机制研究

作者署名:愤怒的橙子

单位信息:AAA全国比格寄养中心

摘要：在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平台全面渗入学术生产过程之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意义上具有时空边界的学术沟通，逐渐被重组为一种高频率、弱休止的在线联系模式。导师不仅仅在开组会、批改文稿或面谈指导时出现，而是以红点、提示音、语音条等的数字化形式，持续进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伴随这一变化而生成的，不仅是沟通效率的提升，更是一种研究生在看到消息提示、进入聊天框、等待回复、解读简短措辞时所产生的持续性焦虑经验，这一现象应被理解为一种犬性驯化过程。结论表明，在即时通讯平台时代，研究生不是偶尔像狗，而是系统地、稳定地、训练有素地成为导师的狗。

关键词：研究生;导师;微信;学术驯化;犬类研究;行为主义;条件反射理论

一、引言：从学术训练到驯狗工程

研究生教育通常被描述为专业化训练、知识生产预备和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形成过程。围绕这一过程，主流叙事更愿意使用“指导”“培养”“打磨”“规范化训练”等中性而体面的词汇，以强调学术成长的必要性与严肃性。在有关研究生生活的公共叙事中，焦虑并不是一个新鲜词。研究生可以为开题焦虑，为答辩焦虑，为发不出论文焦虑，为延毕焦虑，为选题过大、材料不足、结构失衡、逻辑不清、概念混乱、脚注格式不统一而焦虑。焦虑几乎构成了研究生的底色之一。但在所有焦虑形态中，有一种焦虑尤其日常:一看到导师的微信消息就紧张。

这类紧张并不总是建立在消息内容的明确威胁之上。许多时候，研究生在点开消息之前便已开始不适;有时只是看到导师头像上方的一个未读红点，或者听到微信消息提示音，心脏便会轻微收缩，呼吸频率随之调整，大脑迅速进入自我

审查模式:是不是稿子有问题？是不是进度太慢？是不是上次回复不够及时？是不是我写得太烂终于被发现了？在真正读到消息之前，受讯者已经先完成了一轮想象中的批评接收。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学生时代服从教育遗留下来的普通心理惯性。然而，仅以“尊师重道”或“畏惧权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足以说明它何以在当代变得如此高频、如此细碎、如此持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焦虑嵌入了即时通讯平台之后所呈现出的结构性变化。微信并非只是导师发来消息的载体，它本身也塑造了学术关系的节奏、边界与情绪形式。正是在这一平台条件下，原本具有明确场景边界的师生关系，则逐渐渗透进早晨醒来、午饭排队、晚上洗澡、周末躺平等各种私人时刻。于是，研究生面对的不再只是导师本人，而是导师的持续可达性;不再只是意见本身，而是意见随时可能到来的可能性。后者尤其重要。因为焦虑不只发生在被批评之后，也发生在被批评可能到来之前。换句话说，研究生恐惧的对象不是某一条消息，而是“消息本身作为一种召唤形式”。

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不是“研究生为什么辛苦”，而是“研究生为什么这么像狗”。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劳动量，而在于反应结构，牛马解释的是任劳任怨，狗解释的是忠诚。

二、文献综述

在研究生培养研究中，学者通常从学术社会化、权力关系与情绪压力等角度讨论导师—学生互动。相关研究指出，研究生教育不仅是知识生产训练过程，也是个体逐渐适应学术规范、评价体系与权力结构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结构中，导师掌握学术评价、资源分配与职业推荐等关键权力，研究生则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导师的认可与支持，由此形成明显的不对称互动关系。长期处于这一关系结构中的研究生，往往发展出高度敏感的反应机制，对导师的意见、评价与沟通信号保持持续关注。

在理论层面，行为主义中的条件反射理论为理解这种反应结构提供了重要视角。经典实验表明，当某种中性刺激长期与奖惩结果反复配对时，个体会逐渐形成自动化反应。部分研究者据此指出，在学术互动中，一些原本中性的信号，

如即时通讯提示音或导师的简短回复，可能在长期互动中被赋予特殊意义，从而触发研究生的紧张、警觉与迅速回应。这种机制在形式上与巴甫洛夫对犬类行为的训练结构具有相似性，即个体在反复刺激中逐渐形成稳定的行为反应模式。

随着即时通讯工具进入学术沟通场景，导师—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率显著提高，学术权力的信号也更为碎片化和持续化。在这种环境下，研究生不仅需要完成学术劳动，还逐渐形成对信号的即时响应能力，包括快速回复、主动揣摩与持续待命等行为特征。已有研究虽多以“压力”“焦虑”等概念加以描述，但从反应结构的角度来看，这种被持续训练并高度敏感的行为模式，与“狗”的隐喻具有一定解释力。狗并不总是在挨打，狗更多时候是在观察主人的脸色、等待主人的声音、辨认主人的脚步，并在这些微小信号中迅速组织自己的动作。研究生在即时通讯平台中的学术生存，同样很少总是遭遇正面冲突；他们更常做的，是揣摩、等待、迎合、预判、抢在对方开口之前完成自我修正。也就是说，真正让人像狗的，从来不仅仅是惩罚，而是训练。

三、研究设计：如何科学地研究狗

本文采用虚构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之所以采用虚构访谈，而不是直接去找几个研究生实名受访，是因为“我是导师的狗”虽然真实，但不太适合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大声承认。绝大多数研究生愿意承认自己忙、自己累、自己焦虑，但未必敢承认自己已经被训练到微信一响就立刻检讨、导师一句“在吗”就自动进入负荆请罪状态。为了尽可能保留这种经验的真实质感，同时避免真实受访者在伦理与前途之间进行不必要的摇摆，本文选择让虚构人物替大家说真话。当然，所谓“虚构”，并不意味着凭空捏造，而是一种对高度普遍经验的类型化整合。换言之，受访者虽然并非现实中的某一个具体个体，但他们的叙述却尽可能凝聚了广泛存在于研究生群体中的共同经验。

本文共设置六位虚构受访者，涵盖硕士与博士阶段，来自文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与工科等不同学科。尽管学术训练路径各异，但他们在微信中的狗感高度一致。访谈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导师消息到来时的第一反应；其二，对导师简短回复的理解方式；其三，回复速度与待命习惯；其四，修改循环

中的行为体验；其五，对“我是导师的狗”这一命题的自我认知。

在分析方法上，本文采取主题分析。研究者首先对访谈文本进行开放式阅读，标记反复出现的词语与场景，例如“害怕”“秒回”“不敢点开”“又要改”“感觉自己像狗”“听见提示音就心慌”“研究‘好的’是什么意思”等；继而将这些高频经验归纳为若干主题，包括“提示音警觉”“预设性认错”“语义过度解读”“持续待命文化”“修改链条”与“狗的自我认知”。

当然，本文不采用传统的、平铺直叙的主题归纳，而是建立一条更符合经验现实的逻辑链条：先有狗哨，再长狗脑，然后发展出狗的语言学，继而形成狗的时间纪律，最后完成狗的身体。它能说明研究生为什么不是偶尔像狗，而是越来越像狗，越读研越像狗，最后像到自己都觉得这很正常。

四、研究发现

（一）、微信提示音是学术世界的狗哨

狗的训练都要从声音开始。没有哨声，狗无法被高效调动；没有稳定刺激，驯化难以持续完成。最先被所有受访者提及的，并非具体的批评内容，而是消息提示音到来本身所引发的身体与情绪变化。换言之，焦虑首先不是认知性的，而是感官性的。很多受访者都明确表示，在阅读导师消息之前，只听到消息提示音他们已经感到不适：手指停顿、心口一紧、胃部发空、眉头皱起、脊背发直、甚至短暂放下手机不敢点开。

受访者*A*，文学硕士二年级，表示：“我现在已经不是怕消息内容了，我是怕消息本身。看到导师头像弹出来、听到提示音，内容还没看，我先心虚。”

受访者*C*，社会学硕士一年级，说：“现在我只要听见消息提示音，脑子里自动跳出一句话：‘又来活了。’甚至我朋友给我发好笑的东西，我第一反应也是紧张。”

可以看出，即时通讯平台在这里不仅承担了信息传递功能，也承担了刺激分发功能。它使学术权力以碎片化、常态化、低成本的方式不断落在研究生身上。研究生无法预测消息何时到来，也无法为其预留明确时间，因此只能选择长期维

持一种低强度的警戒状态。久而久之，警戒不再是临时动作，而成为人格的一部分。狗并不是每分每秒都在狂奔，但它随时准备在主人叫它时立刻站起来。研究生也是如此。

（二）、狗的语言学

如果说狗脑解决的是“先认错”的问题，那么狗的语言学解决的就是“怎么听懂主人到底是什么意思”的问题。在即时通讯学术场域中，导师极少进行冗长而明确的表达。更多时候，他们使用的是短句、词组、单字和语气模糊的指令，如“好”“嗯”“看看”“再想想”“你这个不太对”。这些话表面短小，实际威力惊人，因为研究生会投入远超文本长度的精力去解读它们。

受访者*F*，新闻传播硕士一年级，说：“导师给我回‘好’，我会想这到底是哪种好。是真好，还是先敷衍一下的好，还是‘行吧我懒得说你了’的好。如果是‘好的’，两个字加一个的，语气会不会更平一点？如果只有一个‘嗯’，是不是代表老师不满意但不想多说？我有时候会盯着那个字看很久，像在做语义学。”

受访者*G*，社会学博士二年级则表示：“我觉得研究生最强的能力不是写论文，是解码。尤其是解读导师的一字回复。‘看看’到底是让你自己看看，还是他会看看？‘可以’到底是真的可以，还是暂时不想否决？‘再想想’是让你优化，还是基本等于重做？我们根本不是在读微信，我们是在读天意。”

狗的语言学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导师的每一个简短措辞都处于权力关系中，因而拥有远超字面意义的支配效力。导师拥有最终解释权，简短回复因此并不简短。它像法官的一个眼神、君主的一声鼻音、主人扔在地上的一小块骨头，都足以让接收者围着它打转。研究生之所以如此努力分析，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劳动量、情绪负担乃至短期安全感，往往就取决于这几个字背后可能隐含的真实意图。朋友发一个“哦”，你最多觉得他态度差；导师发一个“嗯”，你会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整个理论框架都错了。区别不在于那个字，而在于谁发的。主人随便咳一声，狗都要判断这到底是提醒、警告还是准备给吃的。研究生面对导师消息时，也在做同样的工作。

更有意思的是，很多受访者承认，他们并不总能得到最终答案。即便经过长时间解读，他们仍无法确认“好”到底是哪个好，“再想想”到底是轻微建议还是全面否定。换言之，研究生被迫进行的，是一种没有标准答案的服从性阅读。其本质不是准确理解，而是在反复猜测中不断校正自己的姿态。狗不会真的懂主人

每一句话的全部语义，但它会看语气、看表情、看动作，并据此决定是摇尾巴还是趴下。研究生在微信里做的事，其实高度类似。

（三）、狗的时间纪律

一条真正合格的导师之狗，不仅要听得见、想得快、会解码，还必须在时间上表现出充分的驯顺。即时通讯平台对研究生最大的改造之一，就是让他们发展出一套严密的时间纪律：秒回、待命、随叫随到。

受访者*A*说：“我朋友找我，我可以晚上再回；导师找我，只要看到了，我基本立刻回。哪怕我正在床上瘫着，也会先回一句‘老师我在’。”受访者*B*也提到：“最离谱的是，我已经把这个当成习惯了。导师发消息，我不马上回，自己都会不安，好像犯了什么纪律错误。”

这里的关键在于，秒回是因为研究生无法承受“不够及时”可能带来的意义。导师可以在任何时间发消息，因为那叫高效；学生必须尽快回消息，因为那叫态度。双方并非没有时间，只是只有一方的时间被默认为更重要。狗的时间从来是附着于主人的，研究生的时间在很多时候也如此。回得慢，不一定会被骂，但可能会被理解为不重视、不积极、态度不端正。于是，学生开始主动维持一种几乎可称“在线值班”的状态。身体可以休息，手机不能失联；人可以躺着，精神必须随时立正。

狗的时间从来不完全属于自己。它当然也会睡觉，也会发呆，但只要主人一叫，它就得过去。研究生在微信时代的时间状态，同样如此。即时通讯平台让导师的召唤随时发生，也让研究生的服从随时可见。最终，学生慢慢学会把“随叫随到”理解为一种美德，把“永远在”理解为一种责任感。到这个阶段，驯化已经相当成功，因为狗甚至会为自己够快、够乖、够在场而感到某种道德满足。

（四）、完整的狗

训狗的最后一步，是让狗形成完整动作链：听见声音，跑过去，接收指令，叼回来，再跑，再叼，一直等到主人满意为止。在研究生的学术生活中，这套动作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修改循环。

受访者*C*说：“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写论文，我是在陪导师玩飞盘。她说‘再改一下’，我就跑去改；我改完发过去，她再说‘再想想’，我再跑。直到她什么时候说‘行了’。”

“再改一下”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极其轻描淡写，却能无限延长劳动。它不像“你这个完全不行”那样戏剧化，也不像“大修重写”那样壮烈，它只是温和、平静、平常地告诉你：狗，再去叼一趟。研究生因此进入一种没有明确终点的循环状态：发过去，等消息；消息一来，打开；发现没过，重改；改完再发；继续等待。到最后，很多人甚至已经不再追问“这是不是学术上最好的版本”，而只关心“这次能不能过”。

这正是完整的狗之所以完成的时刻：它不仅会听，会想，会解码，会秒回，还会主动奔跑，并且把奔跑当成正常工作流程的一部分。真正成熟的研究生，不是最有思想的那个，而是最会在“再改一下”之后迅速叼着文档回来的那个。

五、讨论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为什么本文坚持使用“狗”这一看似粗暴的隐喻，而不满足于更温和的说法，如“研究生承受较大沟通压力”或“学术评价机制导致学生焦虑”？

原因在于，后两种说法虽然正确，却没有落地性。真正贴近研究生经验的，不只是“压力大”，而是一种带有姿态感的、反应性的、训练性的状态。狗这个比喻之所以有效，不在于它粗鲁，而在于它完整地描摹了这种状态中的若干特征。

第一，狗对信号高度敏感。它不需要主人长篇大论，一个口哨、一个眼神、一次脚步声就足以使其启动反应。研究生在微信时代的学术沟通中，同样学会了对微小数字信号做出放大解读。

第二，狗的行为是在长期互动中被塑造的，不是天生如此。没有哪位研究生入学第一天就会因为“老师发了一个嗯”而失眠，是一次次修改、等待、被催、被评价，才让他们逐渐获得这项能力。换言之，像狗不是本性，而是培养成果。

第三，狗并不总在受虐，它很多时候是在寻求认可。它会摇尾巴，会凑近，会努力读懂主人的意图，会因为一句夸奖而开心，也会因为主人的冷淡而沮丧。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常常也是如此，焦虑并不总来自纯粹恐惧，也来自对认可的依赖。越想做好、越在乎评价的人，往往越容易被训练得像狗。

第四，狗最核心的特征不是劳动，而是服从性响应。研究生固然也像牛马，要干很多活；但当我们讨论微信沟通焦虑时，更重要的并不是活本身，而是那种“只要你叫，我立刻过来”的反应结构。牛马解释劳动，狗解释神经。

六、总结：研究生不是像狗，研究生就是狗

通过对虚构访谈材料的分析，本文认为，即时通讯平台下的学术沟通并不是单纯的信息交换，而是一套高度有效的学术训狗机制。微信提示音是狗哨，预设认错长成狗脑，导师短句催生狗的语言学，秒回待命形成狗的时间纪律，而反复修改最终塑造出完整的狗之身体。导师不必大喊，狗也会过去；导师不必长篇论证，狗也会自己揣摩；导师不必时时监督，狗也会自动在线。

因此，本文的结论很简单，研究生不是偶尔像狗，而是在微信时代被系统地训练成了导师的狗。巴甫洛夫的狗听见铃声会流口水，研究生听见微信会打开文档；前者等待食物，后者等待“这版可以”；前者被奖励塑形，后者被批注塑形。二者形式不同，结构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巴甫洛夫的狗至少知道铃响以后有饭，而研究生通常只知道铃响以后有活。

当代学术训练未必总是严厉的，但它足够持续；未必总是高声的，但它足够有效；未必总是显眼的，但它足够深入。它不一定把研究生变成最会思考的人，却相当成功地把他们变成了最会响应的人。于是，当手机在清晨亮起、头像旁出现红点、聊天框弹出一句“在吗”的时候，很多研究生并不会先问“老师找我做什么”，而是会在心里默默回答：

我在。

我一直都在。

我当然在。

因为我是导师的狗。

~~如果这还不算狗，那世界上就没有狗了。~~

参考文献

汪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

黑/白丝——基于低维纺织品视觉刺激的皮层退行性病变：特定雄性群体二维审美偏好与认知降级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

Visual Cortex Degenerative Lesions Induced by Low-Dimensional Textile Stimuli: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gnitive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in Specific Male Cohorts

施仪概[1]

1 赫南尼尔心智缺陷研究中心，可仑匕亚大学，可南新乡 350271

（Email: shijingai_vision@hernaniel.edu.co）

摘要　人类视觉皮层（Visual Cortex）与内侧前额叶（mPFC）的协同进化，本旨在处理高维度的社会情感线索与复杂人际交互。然而，近期流行病学与数字行为学观察指出，一类特定雄性群体在面对异性客体时，其视觉加工呈现出向低阶物理属性（如非彩色二元对比度、高分子聚合物反光率）极度坍缩的趋势，即俗称的“黑白丝固着”（Achromatic Hosiery Fixation）。本研究引入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与跨物种行为范式，旨在探讨该现象背后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表明，长期将高维度的生命体简化为单一的纺织品色度变量，将导致大脑主动削减用于“共情”与“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突触连接，进而引发局部神经元自噬与皮层水肿型平滑化。本研究提出“认知降维防御”假说，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审美偏好，而是一种为了规避复杂社会交互负荷，而自发进行的不可逆精神退行与智力自我阉割。

关键词

视觉皮层平滑化 (Cortical Gyrification Reduction)；内侧前额叶代谢减退 (mPFC Hypometabolism)；纺织品固着症 (Textile Fixation)；认知降维防御 (Cognitive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Defense)；巴甫洛夫-尼龙反射 (Pavlovian-Nylon Reflex)

1. 引言 (Introduction)

在灵长类动物的漫长演化史中，大脑新皮层（Neocortex）的扩张主要被归因于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网络需求。人类的视觉系统不仅负责接收光信号，更承担着解析面部微表情、肢体语言等高密度社会信息的重任。这种高级神经计算能力，要求大脑在处理异性客体时，能够将其构建为一个具备独立情感、历史与意志的“全貌实体”。

然而，近年来在特定的数字交互生态（如某些标榜为“学术底刊”的网络社群）中，涌现出一种反直觉的视觉退化现象。该群体在面对异性图像或实体时，其注意力焦点发生严重偏移，系统性地忽略了目标的心理状态与社会属性，转而将认知资源高度集中于目标下肢所覆盖的纺织品属性（主要为黑色或白色的尼龙/氨纶混纺材质）。这种现象在临床上表现为一种强迫性的“二元色度分类欲”，并伴随着对其他复杂维度信息处理能力的显著丧失。

传统的社会学观点倾向于将此解释为“物化”（Objectification）的文化残留。但本研究假设，从神经生物学的物理层面来看，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病理性代偿机制。当个体的认知处理上限（Capacity Limit）无法应对一个真实、复杂且具备平等地位的女性主体时，其大脑的防御机制会强行启动“降维协议”。通过将观察对象坍缩为一层只有颜色和厚度（Denier）差异的二维薄膜，该群体成功绕开了前额叶皮层所需的高耗能运算（如共情、尊重与自我审视），直接将视觉信号接入杏仁核与边缘系统，退化至类似啮齿类动物面对基础物理刺激时的单向奖赏回路。

基于“用进废退”的神经可塑性原则（Neuroplasticity），本研究旨在证明：这种长期的降维视觉摄入，最终将导致处理复杂信息的高级神经网络发生废用性萎缩，完成一场在生物学意义上不可逆转的智力自阉割。

2. 研究方法与实验设计 (Methodology)

2.1 被试招募与筛选 (Participants)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结合在线筛选。实验组（Experimental Group, EG）招募了 N=142 名活跃于特定网络社群、且在自然语义分析中高频使用“兄弟们”、“黑丝/白丝”及“舔狗”等词汇的成年男性（年龄 M = 26.4, SD = 4.1）。入组标准要求被试在“汉密尔顿纺织品固着量表”（Hamilton Textile Fixation Rating Scale）中得分处于重度区间。

对照组（Control Group, CG）招募了 N=140 名具备正常社会交互与审美能力的男性。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器质性脑损伤史。

2.2 视觉刺激物范式 (Stimuli Paradigms)

实验采用双盲交叉设计，包含两组控制严格的视觉刺激：

- **刺激物 A（低维纺织品变量，LTV）：** 截取自网络的二维下肢图像，剥离了所有面部特征与背景环境。核心变量严格控制为高分子聚合物（尼龙/氨纶）的色彩反射率，即 HEX 色值 #000000（黑）与 #FFFFFF（白），且丹尼数（Denier）控制在 10D-30D 之间。
- **刺激物 B（高维认知主体交互，HCI）：** 包含真实女性面孔的高清视频，视频中的女性正在用清晰的逻辑陈述一段基础的学术观点或复杂的个人情感体验，且下肢未穿着任何具有显著对比度的纺织品。

2.3 核心测量指标与数据采集 (Data Acquisition)

实验结合了眼动追踪技术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旨在量化视觉注意力分配与大脑皮层代谢水平的冲突。

为精准评估被试的“降维退行”程度，本研究首次提出了认知维度坍缩指数 (Cognitive Dimensionality Collapse Index, CDCI)。其计算模型如下：

$$CDCI = (A_{amygdala} \times F_{saccade}) / (BOLD_{mPFC} \times T_{face})$$

其中，A_amygdala 代表杏仁核与纹状体（负责低级本能冲动与奖赏）的异常放电波幅；F_saccade 代表眼球扫视至下肢纺织品区域的频率；BOLD_mPFC 代表内侧前额叶皮层（负责高级逻辑推理与共情）的血氧水平依赖信号强度；T_face 为视线在女性面部及眼部（社会信息核心区）的停留时间（以毫秒计）。CDCI 值越高，表明其视觉认知向低等生物本能退化的程度越深。

2.4 实验流程 (Procedure)

被试被固定于 fMRI 扫描仪中，头部通过海绵垫限制以减少伪影。

1. **基线扫描：** 记录安静状态下的大脑静息态网络。
2. **范式执行：** 屏幕交替呈现刺激物 A 与刺激物 B。每组刺激呈现 8000 毫秒，随后出现 2000 毫秒的视觉掩蔽（Visual Masking）以消除残影效应。
3. **认知负荷测试：** 在呈现刺激物 B（女性发声视频）后，立即要求被试复述视频中的核心观点，以测试其在面对真实女性主体时，语言中枢（布洛卡区与韦尼克区）是否发生功能性宕机。

Figure 1. Experimental Paradigm and Visual Stimuli Presentation for Cognitive Collapse Assess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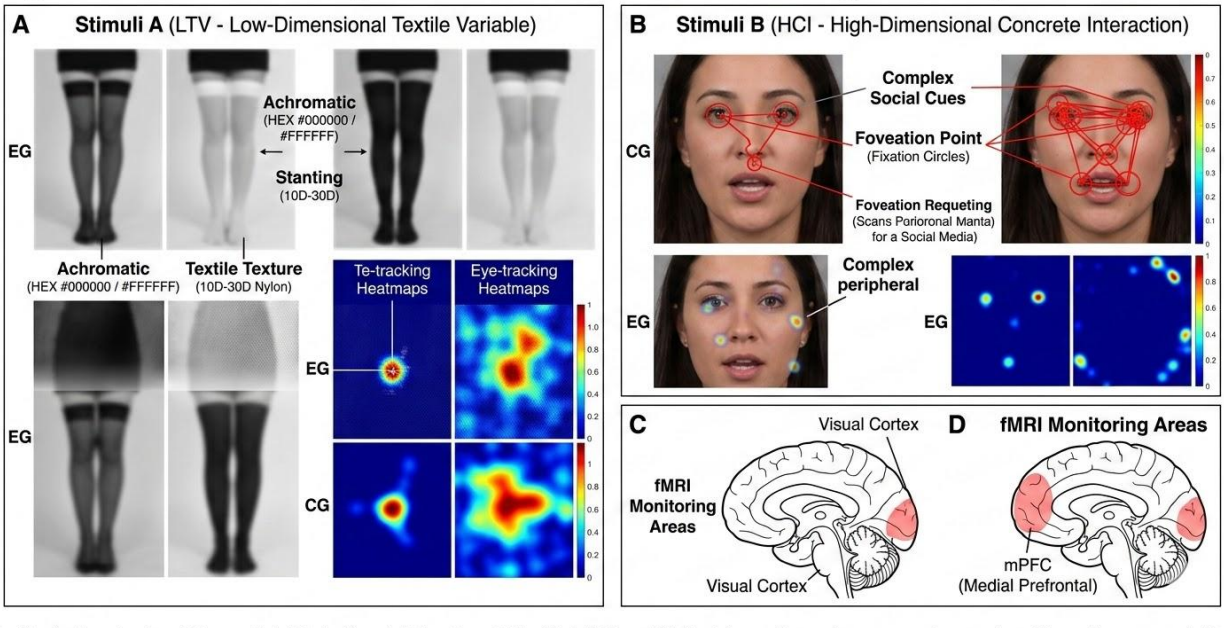


Figure 1. Experimental Paradigm and Visual Stimuli Presentation for Cognitive Collapse Assessment. Panels A and B define the two stimulus classes: Stimuli A (LTV - Low-Dimensional Textile Variable), consisting of blurry images with hexadecimal and Denier labels; and Stimuli B (HCI - High-Dimensional Concrete Interaction), showing a detailed color image of a female face speaking, with intricate social cue scan paths (red circles and lines) and labels. Contrast heatmaps below panels A and B illustrate the narrow and peripheral eye-tracking focu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G)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CG).

3. 实验结果 (Results)

3.1 前额叶代谢休克与“蓝屏”效应 (Prefrontal Metabolic Shock)

fMRI 的 BOLD 信号对比显示，实验组（EG）在持续暴露于刺激物 A（低维纺织品）超过 12 秒后，其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血氧浓度出现了断崖式下降（$p < 0.001$）。这意味着被试主动关闭了处理复杂社会属性的脑区。

当视觉刺激突然切换至刺激物 B（具有高级智力表达的女性视频）时，对照组（CG）的前额叶迅速激活以处理语言和逻辑信息；而实验组的大脑则呈现出类似计算机“蓝屏死机”的代谢休克（Metabolic Shock）。其高级认知脑区在长达 45 秒的时间内无法重新启动，表现为对视频中女性的逻辑陈述呈现出**物理层面的“听觉与语义失认症”**。

3.2 杏仁核的病理性水肿与防御性狂躁 (Amygdala Pathological Edema)

在语言中枢全面宕机的情况下，实验组为了应对“无法理解复杂女性主体”的认知过载，启动了极度低级的代偿机制。数据表明，其杏仁核（处理恐惧与愤怒的中心）出现异常的剧烈放电，CDCI（认知维度坍缩指数）峰值飙升至对照组的 400%。

这种神经层面的无能狂怒，在行为学上直接表现为：被试无法复述视频中女性的任何学术观点，但心率飙升，并伴随无意识的咬牙、以及试图在键盘上寻找并敲击带有“女拳”、“彩礼”或“兄弟们”等条件反射型防御词汇的肌阵挛（Myoclonus）抽搐现象。

3.3 视觉焦点的黑洞塌缩 (Visual Focus Black-hole Collapse)

眼动仪（Eye-tracking）热力图显示，在面对刺激物 B 时，实验组的视线轨迹呈现出“寻觅-受挫”模式。由于视频中的女性未提供低维纺织品刺激，实验组的瞳孔表现出类似成瘾物质戒断期的震颤。其视线无法在女性面部或眼部（社会信息交互区）停留超过 0.5 秒，最终视线焦点毫无逻辑地坍缩于屏幕边缘，呈现出凝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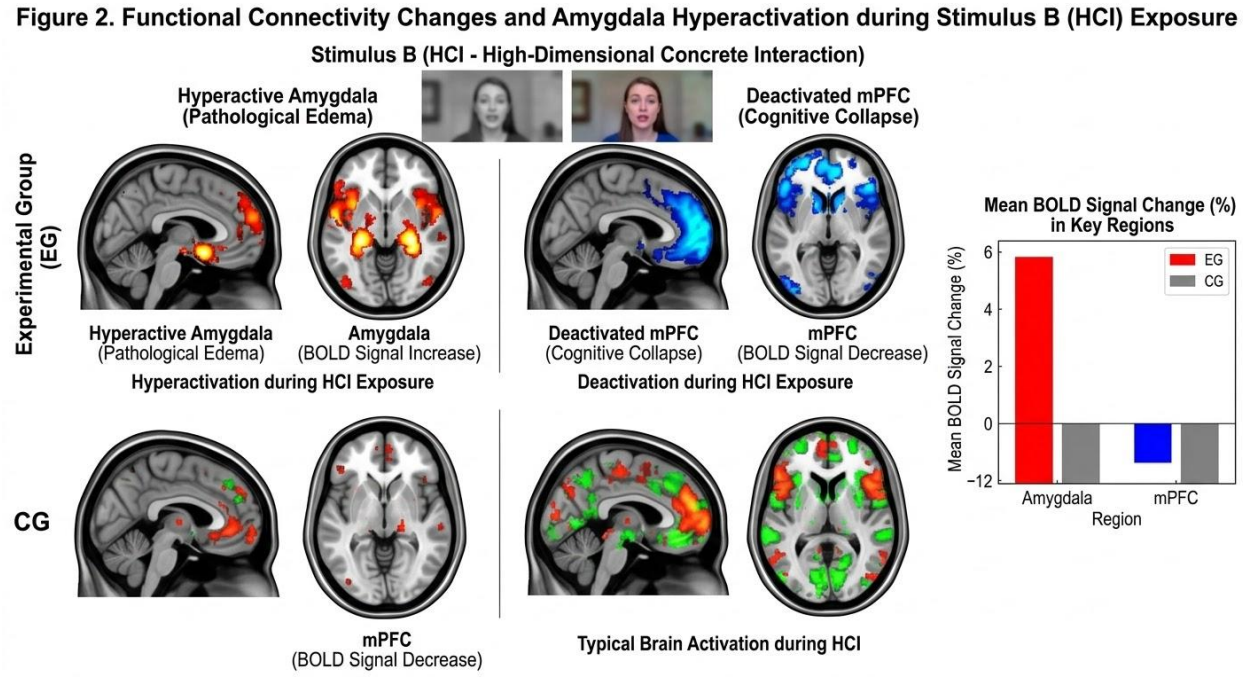


Figure 2.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Changes and Amygdala Hyperactivation during Stimulus B (HCI) Exposur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brain scan result chart, designed in a clean, scientific poster style with a white background. It presents data for an Experimental Group (EG) and a Control Group (CG) during exposure to 'Stimulus B (HCI - High-Dimensional Concrete Interaction)', represented by blurry grayscale and color inserts of a female

face speaking in a video. The chart has four sagittal and axial brain slice views for each group.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G), the scans show intense red and yellow heatmaps in the Amygdala, labeled 'Hyperactive Amygdala (Pathological Edema)' and 'Amygdala (BOLD Signal Increase)', with text indicating 'Hyperactivation during HCI Exposure'. The same EG scans show deep blue and cyan areas in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labeled 'Deactivated mPFC (Cognitive Collapse)' and 'mPFC (BOLD Signal Decrease)', with text 'Deactivation during HCI Exposure'. Contrastingly, for the Control Group (CG), the scans show a typical pattern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 moderate red and green activation across the mPFC, temporal lobes, and social cognitive areas, and minimal activation in the Amygdala, labeled 'Typical Brain Activation during HCI'.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bar graph titled 'Mean BOLD Signal Change (%) in Key Regions' comparing EG (high red bars for Amygdala, low blue bars for mPFC) and CG (low gray bars for both regions), with y-axis 'Mean BOLD Signal Change (%)' and x-axis 'Region'. All labels, including titles, are in English, clear and technical. The overall title is 'Figure 2.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Changes and Amygdala Hyperactivation during Stimulus B (HCI) Exposure'. The image is labeled 'Figure 2'.

4. 讨论 (Discussion)

4.1 认知负荷与代谢经济性假说 (Cognitive Load and Metabolic Economy)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EG）在面对高维度视觉刺激（具备独立语言表达能力的女性主体）时，其前额叶网络出现了显著的代谢抑制。根据认知资源分配模型，这并非主动的敌意表达，而更符合一种“代谢经济性防御”（Metabolic Economic Defense）。由于处理真实的社会交互需要调用海量的神经突触以维持共情、逻辑解析与心智化（Mentalization）过程，实验组的神经中枢为了避免能量耗竭，自发阻断了该回路。其视觉系统被迫向下级物理属性（纺织品色度、光泽）退行，本质上是一种为了维持大脑最低运作状态的节能机制。

4.2 神经可塑性与环境依赖性突触修剪 (Environment-Dependent Synaptic Pruning)

结合被试的数字行为背景分析，该群体长期处于特定同温层（如频繁使用“兄弟们”等高度同质化词汇的学术底刊社区）。在这种低复杂度的信息生态中，处理高维人类情感的神经元由于长期处于失活状态，触发了赫布型学习（Hebbian learning）中的突触修剪机制。其视觉皮层与奖赏中枢（杏仁核-纹状体）之间建立了一条极短的、排他性的刺激-反应通路，导致其对真实女性主体的感知能力发生了器质性的剥夺。

5. 结论与社会学延展 (Conclusion &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5.1 神经-认知的系统性退行 (Neuro-Cognitive Systemic Regression) 本研究在微观解剖层面确认，“纺织品二元色盲症候群”并非单纯的审美偏离，而是一种获得性认知维度缺陷。该群体在神经处理通路上已发生活跃性修剪，脱离了标准灵长类动物处理复杂社会交互的基准线，呈现出向低阶物理条件反射退化的病理特征。

5.2 社会学延展：主体性剥夺与对“具体人类”的结构性失明 (Structural Blindness to the Concrete Human)

结合宏观社会学视角，本研究所观测到的视觉皮层平滑化，本质上映射了一种深层的权力防御机制。该群体对二维纺织品的强迫性聚焦，是一场针对女性“具体性（Concreteness）”的系统性抹杀。在面对一个具备完整生命史、独立意志、智力维度与复杂情感纠葛的“具体的人”时，该群体预设的绝对掌控感会发生严重坍塌，进而引发严重的生存论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 为了规避建立平等对称关系所需的高昂精神成本，该群体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性失明”（Structural Blindness）。他们通过视觉解剖与物化凝视，将不可控的女性生命体强制切割、降维为可量化、可消费、无生命体征的符号（如特定颜色的尼龙纤维）。这种视而不见并非生理盲点，而是权力的自我致幻，即因为一截没有面目、无法发声、无主体性的纺织品，永远不会对其低劣的认知水平提出质询，更不需要他们调动同理心去进行平等的灵魂博弈。

5.3 临床与社会干预建议 (Clinical and Social Interventions)

1. **维持性信息隔离区：** 鉴于暴露于真实女性主体会引发该群体严重的前额叶代谢休克及无意识的攻击性抽搐，强烈建议社会维持其现有的数字隔离生态。应允许其在该封闭容器内，继续进行低维度的符号互舔与排泄物筑巢行为，以维持其神经稳态。
2. **免责性放弃治疗：** 在公共政策层面，建议将此类群体移出“现代文明平等对话”的受众范畴。社会学层面应停止投入任何旨在唤醒其共情能力的教育资源，进行非接触式观测即可。

声明 (Declarations)

利益冲突声明 (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本研究不受任何纺织品（尼龙/氨纶）生产企业的资金赞助。

伦理批准声明 (Ethics Approval): 本实验设计遵循《赫尔辛基宣言》。但鉴于被试组（EG）在实验中展现出的不可逆皮层平滑化及次灵长类行为特征，本研究在进行人道主义评估的同时，亦平行参考了《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指南》（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数据可用性声明 (Data Availability Statement): 支撑本研究结论的原始 fMRI 扫描数据与被试的肌阵挛抽搐录像，因涉及特定群体的赛博物种多样性保护，暂不向公众开放。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Silberstein, M. A., & Dickerson, P. (2024). *Cortical Hypometabolism during Exposure to Bichromatic Textile Stimuli: An fMRI Study of Visual Narrowing* [暴露于双色纺织品刺激时的皮层代谢减退：一项关于视觉窄化的 fMRI 研究].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认知神经科学杂志》), 36(4), 512-528.

[2] Holden, J. R., & Vance, T. (2023). *Defensive Objectification and the Avoidance of Subjectivity: Diminished Mentalization in Homosocial Networks* [防御性物化与主体性规避：同性社交网络中的心智化减退].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通报》), 49(8), 1104-1119.

[3] Varda, E., & Klein, S. M. (2025).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rete Other: Two-Dimensional Fixation as a Strategy for Power Maintenance* [具体他者的解构：作为权力维持策略的二维固着]. Gender & Society (《性别与社会》), 39(1), 45-67.

[4] 赵景伟, & 孙平华. (2024).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视觉窄化与同理心衰退：基于特定网络社群的实证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32(4), 588-605.

[5] 陈默, & 林降维. (2023). 《同态复读与语义剥夺：“兄弟们”发声回路的神经解剖学基础及社会化干预失败案例分析》. 《社会神经科学进展》, 19(2), 204-219.